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在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
（1949年7月4日）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3
（1949年7月6日）
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4
（1949年7月7日）
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9
（1949年7月7日）
九月或十月前闽粤赣边纵队须独力作战 ……10
（1949年7月9日）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 ……12
（1949年7月9日）
四野应以一部向长沙湘潭推进 ……15
（1949年7月10日）
复左协中将军等电 ……17
（1949年7月11日）
关于打胡战役的指示 ……18
（1949年7月14日）
歼灭马步芳等部的部署 ……20
（1949年7月14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一书题词 ……21
（1949年7月15日）
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 ……22
（1949年7月16日、17日）
军委关于对程潜的方针的指示 ……28
（1949年7月18日）
致林彪、邓子恢、萧克电 ……31
（1949年7月18日）
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 ……32
（1949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武昌划归湖北省建制致华中局电 ……33
（1949年7月21日）
陈赓邓华两兵团进攻广东的部署 ……34
（1949年7月21日）
复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电 ……36
（1949年7月21日）
复华东局电 ……37
（1949年7月21日）
致周恩来电 ……38
（1949年7月21日）
关于李达去湖南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的批示 ……39
（1949年7月21日、26日）
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 ……40
（1949年7月22日）
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等电 ……41
（1949年7月23日）

对举行平凉战役以及西进作战的意见 ……42
（1949年7月23日）
陈赓邓华两兵团在湘赣粤的行动计划 ……44
（1949年7月24日）
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题词 ……46
（1949年7月24日）
陈赓邓华等兵团进军地区和路线问题 ……48
（1949年7月25日）
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 ……50
（1949年7月25日）
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 ……51
（1949年7月26日）
关于转发方方、魏金水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的批语 ……52
（1949年7月27日）
为戏曲改进会发起人大会题词 ……53
（1949年7月28日）
关于刘少奇可先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致刘少奇、王稼祥电 ……54
（1949年7月31日）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56
（1949年7月31日）
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年的历史经验 ……60
（1949年7月）
中央关于华南分局、华中局、西南局的干部配备及其管辖范围的指示…69
（1949年8月1日）
为《河北日报》题写报头 ……72
（1949年8月1日）

为《唐山劳动日报》题写报头 ……73
（1949年8月1日）
复粟裕等电 ……74
（1949年8月2日）
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 ……75
（1949年8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问题致东北局电 ……76
（1949年8月3日）
复刘少奇、王稼祥电 ……77
（1949年8月4日）
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 ……78
（1949年8月4日）
对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的批语 ……79
（1949年8月5日）
复程潜电 ……80
（1949年8月5日）
致林彪、邓子恢等电 ……81
（1949年8月5日）
致华中局等电 ……82
（1949年8月5日）
争取程潜等站在我们方面有极大的政治作用 ……83
（1949年8月6日）
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额尔德尼等 ……85
（1949年8月6日）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 ……86
（1949年8月6日）

复刘少奇、王稼祥电 ……90
（1949年8月7日）
复华东局电 ……91
（1949年8月7日）
致方方等电 ……92
（1949年8月8日）
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解决河南土地问题 ……93
（1949年8月10日）
给杨开智的信 ……94
（1949年8月10日）
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 ……95
（1949年8月11日）
复周世钊电 ……97
（1949年8月11日）
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98
（1949年8月13日）
复陈明仁电 ……99
（1949年8月13日）
为《铁军报》题写报头……101
（1949年8月13日）
给胡乔木的信……102
（1949年8月13日）
复华东局电……103
（1949年8月14日）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04
（1949年8月14日）

复程潜、陈明仁等电……111
（1949年8月16日）
致陈云等电……112
（1949年8月17日）
别了，司徒雷登……113
（1949年8月18日）
致阿哈买提江电……120
（1949年8月18日）
给江庸的信……121
（1949年8月19日）
中央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规定……123
（1949年8月19日）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24
（1949年8月20日）
致东北局电……125
（1949年8月21日）
复彭德怀等电……126
（1949年8月22日）
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127
（1949年8月22日）
贺美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电……129
（1949年8月23日）
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130
（1949年8月23日）
给黄炎培的两封信……133
（1949年8月24日、26日）

给胡乔木的信……135
（1949年8月24日）
复东北局电……136
（1949年8月24日）
复王首道等电……137
（1949年8月24日）
不论新区、老区均须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138
（1949年8月25日）
对攻打兰州的几点意见……140
（1949年8月26日）
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42
（1949年8月26日）
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给彭真的信……144
（1949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致东北局等电……146
（1949年8月26日）
复彭德怀电……148
（1949年8月26日）
致傅作义电……149
（1949年8月26日）
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50
（1949年8月27日）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51
（1949年8月28日）
给吴玉章的信……158
（1949年8月29日）

致华中局电……159
（1949年8月29日）
致各中央局、分局电……160
（1949年8月30日）
“友谊”，还是侵略？……161
（1949年8月30日）
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165
（1949年8月30日）
关于欢迎出席新政协会议致程潜电……166
(1949年8月30日)
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68
（1949年8月）
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以利我军歼灭之……169
（1949年9月1日）
为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纪念题词……171
（1949年9月1日）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72
（1949年9月2日）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73
（1949年9月3日）
复彭德怀电……175
（1949年9月4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批语……176
（1949年9月）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179
（1949年9月4日）

给周恩来、聂荣臻的信……181
（1949年9月4日）
致陈明仁电……182
（1949年9月5日）
在审校《共同纲领》草案时改写的三段话……183
（1949年9月6日）
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184
（1949年9月7日）
对赣州会议及进军华南的指示……186
（1949年9月8日）
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188
（1949年9月8日）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各线我军连续奏捷……189
（1949年9月8日）
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192
（1949年9月9日）
复邓力群等电……194
（1949年9月10日）
复邓力群电……195
（1949年9月10日）
和张治中的谈话……196
（1949年9月10日）
复彭德怀电……197
（1949年9月10日）
祝波立特连任英共总书记二十周年的贺电……198
（1949年9月10日）

为《中国儿童》创刊号题词……199
（1949年9月10日）
给向振熙的信……201
（1949年9月11日）
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202
（1949年9月12日）
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及邓小平电……203
（1949年9月12日）
复饶漱石电……204
（1949年9月12日）
复叶剑英、陈赓电……205
（1949年9月12日）
致王首道电……206
（1949年9月13日）
复谭戒甫电……207
（1949年9月13日）
给周北峰的信……208
（1949年9月14日）
祝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召开二次大会的贺电……209
（1949年9月15日）
祝加香八十寿辰的贺电……210
（1949年9月15日）
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11
（1949年9月16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216
（1949年9月16日）

复邓力群等电……232
（1949年9月19日）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233
（1949年9月19日）
复傅作义电……234
（1949年9月19日）
复邓力群等电……235
（1949年9月20日）
用打拉两种办法迅速解决宁夏问题……236
（1949年9月20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回答董其武等起义通电……237
（1949年9月20日）
聂荣臻将军、薄一波政委电贺绥远和平解放……239
（1949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人员问题给各中央局的指示……242
（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244
（1949年9月21日）
给张治中的信……263
（1949年9月21日）
给沈雁冰的信……266
（1949年9月23日）
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267
（1949年9月23日）
复彭德怀电……269
（1949年9月23日）

复鲍尔汉电……270
（1949年9月23日）
毛泽东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国都和纪年问题时的发言 ……271
（1949年9月25日）
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紧密合作……272
（1949年9月26日）
关于组织部分政协代表发言给周恩来的信……274
（1949年9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庆祝新政协召开和人民政府成立的指示……275
（1949年9月27日）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陶峙岳鲍尔汉……279
（1949年9月28日）
叶剑英将军奉命南下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281
(1949年9月28日）
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283
（1949年9月29日）
为《新华月报》题写报头……285
（1949年9月29日）
为《新建设》杂志创刊题词……286
（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288
（1949年9月30日）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295
（1949年9月30日）
为《新华日报》第一次题写报头……298
（1949年9月）

为《黑龙江日报》题写报头……299
（1949年9月）
为《新建设》题名……301
（1949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302
（1949年10月1日）
给侨胞的题词……336
（1949年10月1日）
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338
（1949年10月3日）
对程潜陈明仁所提要求和建议的处置意见……339
（1949年10月5日）
关于安排程潜、陈明仁、李明灏看望王耀武、杜聿明、黄维等的电报…342
（1949年10月5日）
在马叙伦请假信上的批语……343
（1949年10月5日）
给黄炎培的信……344
（1949年10月5日）
答谢福斯特、但尼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345
（1949年10月6日）
同意第四野战军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347
（1949年10月7日）
中央关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广州军管会等机构的电报……348
（1949年10月7日）
转发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的批语……349
（1949年10月7日）

关于杨开智等工作安排问题的电报……352
（1949年10月9日）
给谭政、陶铸的信……353
（1949年10月9日）
同意聚歼白崇禧主力的作战计划……354
（1949年10月10日）
毛泽东、朱德致“长治”号舰全体起义人员电……355
（1949年10月10日）
对新疆赵锡光、鲍尔汉、马良骏等祝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复电…356
（1949年10月10日、21日）
十八兵团由贺龙统率入川……358
（1949年10月11日）
十五兵团暂不进攻广州……359
（1949年10月11日）
关于同意约鲍尔汉至酒泉商谈的电报……361
（1949年10月11日）
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362
（1949年10月11日）
慎重考虑围歼白崇禧部计划力求做到确有把握……363
（1949年10月12日）
相机占领广州和围歼白崇禧部……365
（1949年10月12日）
关于草拟华东军政委员会名单给陈毅的信……369
（1949年10月12日）
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370
（1949年10月12日）

转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372
（1949年10月13日）
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375
（1949年10月13日）
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378
（1949年10月13日）
在表扬歼灭白崇禧主力的部队的电报上的批语……379
（1949年10月13日）
给冯友兰的信……380
（1949年10月13日）
给上海市纸业革新促进会的题词……382
（1949年10月13日）
为《南方日报》题写报头……383
（1949年10月13日）
为了解罗章龙的情况致湖南省委电……385
（1949年10月14日）
中央关于发表广州军管会和市政府就职布告的电报……386
（1949年10月15日）
中央关于新疆三区代表和彭德怀会谈问题的电报……387
（1949年10月15日）
同意分步骤在新疆进行军事工作……388
（1949年10月15日）
为《中苏友好》杂志创刊号题词……389
（1949年10月15日）
给张仲实的信……391
（1949年10月15日）

致卫立煌电……392
（1949年10月15日）
给周世钊的信……393
（1949年10月15日）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95
（1949年10月16日）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电报……398
（1949年10月16日）
四兵团应乘胜追击占领高要德庆等县……399
（1949年10月17日）
解放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400
（1949年10月19日）
关于高凌云师与陕北伊盟部队合编的电报……402
（1949年10月19日）
中央关于物色民主分子参加广西工作的电报……403
（1949年10月19日）
给斯大林的信……404
（1949年10月20日）
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405
（1949年10月20日）
对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祝贺新疆和全国解放的复电 ……412
（1949年10月21日）
关于写解放军进入新疆的短评给胡乔木的信……413
（1949年10月21日）
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写的碑文和唁电……414
（1949年10月、11月）

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的批语……416
（1949年10月23日）
中央关于新疆问题致彭德怀电……418
（1949年10月23日）
祝贺“海辽”号轮起义致方枕流等电……420
（1949年10月24日）
在一则新闻稿上的批语……421
（1949年10月24日）
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422
（1949年10月24日）
中央关于召开西北局会议的电报……430
（1949年10月25日）
军委关于同意解除十兵团出击潮汕任务的电报……431
（1949年10月25日）
中央关于湖南临时省政府改组问题的电报……432
（1949年10月25日）
转发人民解放军入疆综合报告……433
（1949年10月25日）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35
（1949年10月26日）
复霍查同志电……437
（1949年10月26日）
复拉比·蒲哈利电 ……438
（1949年10月26日）
关于撤销迪化伪监委行署的电报……439
（1949年10月27日）

关于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致斯大林电……440
（1949年10月28日、30日）
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442
（1949年10月29日）
关于董其武部改编问题给薄一波的信……444
（1949年10月29日）
转发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报告的批语……445
（1949年10月30日）
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447
（1949年10月31日）
关于华中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致林彪等电……450
（1949年10月31日）
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写的序言……452
（1949年10月）
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453
（1949年11月1日）
对空军关于航校校址问题报告的批语……455
（1949年11月1日）
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农村政策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电……456
（1949年11月2日）
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关于长安县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指示……458
（1949年11月2日）
中央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459
（1949年11月2日）
军委关于同意定海作战方案致粟裕等电……461
（1949年11月4日）

关于改造和补充陈明仁部致林彪电……462
（1949年11月4日）
关于收集和研究上海税收办法的批语……463
（1949年11月4日）
为国立戏剧学院题名……464
（1949年11月4日）
中央关于上报新疆等省政府名单致彭德怀电……466
（1949年11月6日）
中央关于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电报……467
（1949年11月6日）
对聂荣臻关于卫生部问题报告的批语……468
（1949年11月6日）
对关于空军司令部名称和关防尺寸刊发问题的批语……470
（1949年11月6日）
中央关于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电报……471
（1949年11月7日）
邓华兵团可以分出一个师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敌军……473
（1949年11月9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去莫斯科时间致王稼祥电……474
（1949年11月9日）
中央关于征询政协党外代表对华东政权机关意见的电报……475
（1949年11月10日）
向董其武部调派的政工干部必须加以训练……476
（1949年11月11日）
关于安排西蒙诺夫到广西前线参观的电报……477
（1949年11月11日）

致斯大林电……478
（1949年11月12日）
祝贺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的电报……479
（1949年11月12日）
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480
（1949年11月14日）
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481
（1949年11月14日）
给毛远翔的信……483
（1949年11月14日）
对创办三所军医大学报告的批语……484
（1949年11月14日）
给毛煦生的信……485
（1949年11月15日）
给毛泽青的信……487
（1949年11月15日）
欢迎仇鳌来京的电报……488
（1949年11月17日）
给李介侯的信……489
（1949年11月17日）
给张四维的信……490
（1949年11月17日）
中央转发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电报的批语……491
（1949年11月19日）
致宣布脱离国民党当局的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电……493
（1949年11月19日）

答谢兰那地夫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494
（1949年11月19日）
答谢萨拉·博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495
（1949年11月19日）
复电感谢伊朗共产党……496
（1949年11月19日）
关于同意工作方针致彭德怀电……497
（1949年11月19日）
为《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题词……498
（1949年11月20日）
关于任弼时治病问题致斯大林电……500
（1949年11月21日）
军委关于张治中去兰州致彭德怀电……501
（1949年11月22日）
中央关于要华中局对处理旧人员提出意见的电报……502
（1949年11月22日）
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504
（1949年11月23日）
致班禅额尔德尼电……506
（1949年11月23日）

在中央团校
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49年7月4日）

同志们：

你们今天毕业了，我来看看，讲几件事情。

我们共产党有二十八年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七个人、十一个党员[1]，第二年一九二二年不过一二百人。今天你们团校就有五百人，而且还全是干部，这说明是发展！你们不是学了唯物史观吗，这就是唯物史观上所说的发展。同志们，苏联共产党开始也只是列宁等几个人，今天成为联邦的大党。我们今天已是全国范围内第一大党，但还有些农村、工厂未有支部，再过几年之后将成为全国的党，联邦的党。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无论做什么，都要有个目的，没有目的前进，乱来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很多次，拿洪秀全来说，他们就要搞个太平天国，他们的太平，意思就是没有人剥削人、压迫人，不打仗，天国不是旧国，是世界大同，同天上一样。但是他们不能做成功的，只有我们领导，和你们及广大群众在一起，共同斗争才行。

---

[1] 原记录稿如此。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人（其中包惠僧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二大时全国党员195名。

有人说共产党好，为什么不早一百年出来，不是可以早实行共产主义吗？你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到共产党的，道理是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在一百年前，只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在封建社会就不可能有共产党的。

你们学了唯物史观后就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就不要人民解放军，不要共产党了。有人说，不要共产党那还得了？就是因为得了才不要的，才取消的。那时也有警察，今天的警察两种性质，国民党统治时是用来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所谓维持秩序是维持反动的秩序；而解放后我们的警察两种任务，一是镇压反革命，二是维持秩序。到那时他们任务则只有一个，就是维持秩序而不是镇压反动派了。有人害怕反动派不镇压不行，就是因为没有反动派了，你镇压他干嘛！

同志们，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对不起，你们等了好久，我今天讲话完了。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9年7月6日）

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1949年7月6日，毛泽东等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

（1949年7月7日）

自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中华民族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伟大的爱国战争以来，今年的“七七”是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一次纪念。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由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我全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的种种要求，现在都已开始实现了。

三年来的人民解放战争，实际上是八年抗日战争的继续发展。我全国人民在十二年前首先向法西斯侵略势力的东方战线作战，奋斗八年之久，经历重大牺牲，终于与盟国共同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举世皆知，在战争结束以后，创巨痛深的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达到战争的目的，而且遭受了新的严重的灾难。抗日战争要求民族独立，但是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强迫我们做美国殖民地的奴隶。抗日战争要求民主改革，但是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强迫我们接受蒋介石的法西斯恐怖。抗日战争要求在战争结束以后实现国内和平，以便恢复和发展国家的建设，但是美国政府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大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比在日本侵略期间有过之无不及。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敢于如此倒行逆施，是认为他们的力量大

过人民的力量。但是他们计算错了。需要八年时间协同各国力量才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经过三年时间就基本上战胜了主要由美国政府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虽然仍图最后挣扎，但是已经不要很久就可以全部肃清。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成立，不久就可以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49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冒雨出席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

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国家的时候，当然要和一切愿意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同时，我们当然要反对一切方式的侵略和威胁，这些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在反对各种侵

略和威胁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出日本的问题。中国是离日本最近，与日本关系最密切，并且是抵抗日本最早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处理日本问题必须征求中国的意见，决不允许由美国政府一意孤行，擅作决定。中国虽然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中日两国的人民却极愿意在日本按照波茨坦协定实行非军国主义化而且是民主化的条件下和平相处，建立经济的和文化的合作。不过，中日两国人民的这种共同愿望现在却受着阻挠，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控制着日本。美国政府和美国统帅部的对日政策不是执行波茨坦协定而是推翻波茨坦协定，不是使日本非军国主义化，不是使日本真正民主化，而是使日本反民主化，继续军国主义化。美国政府不愿意迅速签订对日和约，而企图无限期地拖延对日和约，无限期地占领日本，使日本不能与中国和其他外国建立和平关系，而只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显然地，美国政府的这种反动政策直接威胁着中国人民，也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而且很严重地剥削日本人民。当我们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力量认为必须引起全世界注意：为了最后实现抗日战争的目的，我们一致要求迅速签订对日和约；我们一致主张在准备对日和约的时候，必须严格地遵照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由四国外长会议准备的程序，并且必须由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派遣中国的全权代表。

在中国人民今后的道路上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止我们的前进。我们的奋斗从来不是孤立无援的。在国际民主阵营中间，有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这首先就是苏联，其次就是各新民主国家，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为独立而奋斗的人民，和全世界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人民。国际民主阵营的力量，愈来愈大地超过帝

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帝国主义阵营虽然全力援助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力量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帝国主义阵营虽然签订准备新侵略战争的北大西洋公约，却没有力量阻止苏联和平外交的胜利，例如在最近的四国外长会议上关于德国统一原则问题和对奥和约问题所成立的协议。帝国主义阵营虽然大吹大擂地实行所谓马歇尔计划，却没有力量阻止美英等国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个爆发的时间已经很迫近了。世界的发展方向，决定于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力量，不决定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现已丧失主动，处于被动，正在向着埋葬自己的坟墓走去。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打倒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
中国民主同盟	沈钧儒
	章伯钧
民主建国会	黄炎培
无党派民主人士	郭沫若
中国民主促进会	马叙伦
中国农工民主党	彭泽民
中国人民救国会	史良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谭平山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蔡廷锴
中国致公党	陈其尤
中国人民解放军	朱德

中华全国总工会　李立三
解放区农民团体　刘玉厚
产业界民主人士　陈叔通
文化界民主人士　沈雁冰
民主教授　张奚若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廖承志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蔡　畅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谢邦定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周建人
国内少数民族　乌兰夫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陈嘉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

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1]

（1949年7月7日）

在我夺取舟山群岛及台湾以前，可能继续封锁下去，故你们的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准备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封锁我们一个长时期，而我们则仍有办法，克服困难。假如情况真是这样，则不仅有对我不利一方面，还有对我有利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被封锁情况，动员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巩固阵地。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的主要内容。

九月或十月前闽粤赣边纵队须独力作战[1]

（1949年7月9日）

华南分局，方，魏、朱，并告四野，三野：

午江电悉。（一）同意你们的部署。（二）我第四野战军业已部署完毕，日内开始向白崇禧[2]进攻，待目前开始的战役[3]告一段落后，即可以有力一部进占赣州及赣南十七县，究竟何时可占赣州及赣南各县，现尚不能确定，大概九月或十月是可能的。（三）我第三野战军的有力兵团现正开始由上海南进，大约八九两月可占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如有必要，可由该兵团于歼灭闽西、闽南等处敌人之后，以一部协助你们歼灭韩江流域之敌并占领潮汕[4]。请三野转知叶飞张鼎丞[5]诸同志注意。（四）在我三野部队进占闽西、闽南，四野部队进占赣南之前，我闽西、韩江、东江各部须独力作战，依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适当机动处理，不要依靠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分局书记方方、闽粤赣边纵队政治委员魏金水、副政治委员朱曼平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指第四野战军为在湘赣边境歼灭白崇禧集团，以第十二、第十五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共9个军，于1949年7月上旬发起的湘赣战役。这个战役7月19日结束，歼敌4600余人。

[4] 潮汕，指广东潮州和汕头。

[5] 叶飞、张鼎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援。（五）请三野令叶飞电台与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电台（现在梅县）接通联系，请四野准备于八月或九月间令接受进占赣南任务之我军与方方台接通联系。（六）方方、魏金水午江电即转发三野、四野知照。

军委

午佳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1]

（1949年7月9日）

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修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修筑的每一条铁路，都是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目的相配合的。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榨取我们的工具。当然，那时要想把铁路建设好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和发展铁路。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们早就不相信它能办好铁路。在辛亥革命前就想修筑成渝铁路，并在辛亥那年闹过保路风潮，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这条铁路国民党政府只修了很短的一小段。这就说明靠国民党政府要办好铁路是不可能的。我们跟它是不同的，我们能够恢复铁路和建设好铁路。过去，我们是无产阶级，什么“产”都没有，怎么能修建铁路呢？今天，我们个人没有“产”，但我们有了国家，有了群众，有了干部，有了工程师……，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就有力量，就能够修好铁路。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

---

[1] 这是毛泽东向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

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二十二年以前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就到井冈山上，成立自己的军队——红军。那时人很少，枪也很少。开始时，大家都说不行，国内外敌人反对我们，说我们是“匪”。匪者非也，就是说是“不应当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四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行不行呢？行得很。拿铁路来说，我们也要和国民党比一比，看谁把铁路办得好，是国民党办得好呢，还是我们办得好？这在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到证明。但我相信，大概一年左右，特别是在东北，铁路事业就可以走上轨道了。将来我们再逐渐改进和发展，一定能在全国把铁路办得比国民党好。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最下层群众，这是基本的；但同时也要依靠各级领导，没有领导也是不行的。我们两者都要依靠。

我们快要成立联合政府，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了。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或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人民铁路建设事业就可以从少到多，从二万多公里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蒋介石有那么多的军队、大炮，工人也比我们山沟里的工人多得多。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就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个转变不也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依靠群众，就是说你当司令或是当班长必须要有一个

队伍，这个队伍就是群众，没有队伍，你怎么当司令，怎么当班长呢？我姓毛，我只一个人，要当班长是不行的，要当司令更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我在这会议上向你们提出，不管是老干部或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众和重视群众，这样你们所要组织的铁路工会，就能搞得很好了。

四野应以一部向长沙湘潭推进[1]

（1949年7月10日）

林、邓、萧、赵：

（一）据报白崇禧[2]拟在攸县、茶陵、安仁地区与我作一决战，现四十六军军部及一个师已至安福，七军一个师已至莲花，四十八军一个师有向永新消息。这些是防我陈赓部[3]经攸、茶、酃[4]切断其衡阳后路的。如我军此次作战，能于袁州[5]、醴陵线上及其以南围歼一部桂军，则白匪所谓攸、茶、安决战，是不可能的。否则，你们须准备于该区作战。（二）在株洲、衡阳线以东，即攸、茶、酃、安地区作战，或在衡阳以南作战，是一个新的步骤，须在我军占领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之后，利用粤汉路[6]及湘桂路运输才能作新的部署。当我军于进至醴陵、萍乡地区时，长岳线[7]上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陈赓部，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4] 攸、茶、酃，指湖南攸县、茶陵和酃县。

[5] 袁州，即江西宜春。

[6] 粤汉路，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7] 长岳线，指长沙至岳阳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陈明仁鲁道源[1]两部必将迅速撤退。因此，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2]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军委

午灰

[1] 陈明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鲁道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八军军长。

[2] 岳州，即湖南岳阳。

复左协中将军等电[1]

（1949年7月11日）

左协中将军及前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全体官兵们：

接读通电，贵将军等率部接受和平解决方案，使贵军及榆林一带人民咸庆解放，极为欣慰。尚望努力团结部队，加强整训，改造官兵、军民关系，为参加西北解放斗争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

[1] 原国民党二十二军左协中将军等接受和平解决该军方案，毛泽东和朱德复电嘉勉。

关于打胡战役的指示[1]

（1949年7月14日）

彭、张、赵：

文午电悉，打胡战役已开始，甚慰。我军以尽量向西迂回包围多数敌人，然后歼击为有利。

军委

寒子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打胡战役的指示》的手稿。

歼灭马步芳等部的部署[1]

（1949年7月14日）

彭、张、赵：

（一）元日两电悉，歼胡四个军[2]甚慰。（二）马[3]匪既有反扑援胡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三）一兵团如已追至宝鸡，即用该兵团歼灭宝鸡、凤翔之敌，然后由凤翔抄至马匪后面，如属可能亦是有利的，请相机酌定。

军委

寒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6月，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向进占西安、咸阳地区的第一野战军反扑受挫后，被迫西移转入防御。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钳马打胡，后钳胡打马的方针，于7月11日发起扶眉战役。14日战役结束，共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4.3万余人，解放了陕中地区。

[3] 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一书题词

（1949年7月15日）

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一书的题词。

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1]

（1949年7月16日、17日）

一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2]：

十四日二十时电[3]悉。

（一）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4]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二）判断白崇禧[5]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就追歼国民党军白崇禧部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并告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两封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指林彪、邓子恢、萧克1949年7月14日20时关于对南撤之敌的作战计划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4] 曾生（1910—1995），广东惠阳坪山镇（今属深圳市）人。当时任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

[5]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1]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

（三）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四）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3]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刘邓[4]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5]率十万人左右

---

[1]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2] 关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1949年9月12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3] 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第二野战军。

[5] 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

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1]四省。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但你们的五十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匪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

（五）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否？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

（六）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庾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

（七）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八）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

（九）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军委

午铣

---

[1] 康，指西康省。

二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陈、饶、粟[1]：

午铣电[2]谅达，兹补充数点，请你们连同午铣电一并考虑电复。

（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3]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三）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

---

[1] 陈、饶、粟，指陈毅、饶漱石、粟裕，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午铣电，即本篇一。

[3] 袁州，即江西宜春。

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1]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间，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一野歼灭，其残部仅剩七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一野决以九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2]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三个军出川北，协同二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委

午篠

---

[1] 卢汉（1895—1974），云南昭通人。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2] 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和副长官。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手稿。

军委关于对程潜的方针的指示

（1949年7月18日）

林、邓、萧、赵：

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悉。

（一）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要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

（二）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

（三）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

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如何望复。

军委

十八日下午四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对程潜的方针的指示》的手稿。

致林彪、邓子恢、萧克电[1]

（1949年7月18日）

如果属实，则你们应令十二兵团占领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不要去占株洲，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程潜各部集中长沙是否属实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邓子恢、萧克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1]

（1949年7月19日）

以三个兵团追歼两马[2]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3]（但可不占褒城），迫使南山[4]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的主要内容。

[2] 第一野战军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为追歼青海的马步芳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准备以第一、第二兵团出陇县，截击陇东；估计两马将总撤退，准备以第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猛追。

[3] 褒城，旧县名，今分属勉县和汉中市。

[4] 南山，指秦岭山脉以南的汉中、勉县、南郑地区。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武昌划归湖北省建制致华中局电

(1949年7月21日)

华中局：

七月八日电悉。同意[1]武昌划归湖北省建制。

中央

午马

[1]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为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陈赓邓华两兵团进攻广东的部署[1]

（1949年7月21日）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2]及华南分局：

（一）同意你们七月十七日电[3]（二十一日才收阅）整个部署方针。（二）陈赓[4]与邓华[5]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6]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宋，指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此时已调任南京军管会副主任。张、李，指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指1949年7月17日林彪、邓子恢、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陈赓、邓华两部目前即向广东出动。但该两部统经赣州、南雄、始兴则太拥挤，陈赓以两个军经遂川、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敌不退，则直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敌人退路；如到桂东后，敌已撤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上犹向始兴前进。邓华之两个军则经赣州、南康、南雄向翁源前进。

[4] 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邓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

[6] 南始，指广东南雄和始兴。

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四）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1]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五）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六）此间当令叶剑英[2]同志提早赴粤。

军委

午马

[1]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

[2]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和北平市市长。

复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电

（1949年7月21日）

布拉·罗加同志：

谢谢你对于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祝贺。中国和古巴是两个距离很远的国家，但是两国人民斗争的基本目标确是一致的，这个情形，造成了两国人民的不可分离的国际友谊，如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友谊一样。祝勇敢的古巴人民和古巴人民社会党人对于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胜利！祝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复华东局电[1]

（1949年7月21日）

邓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达。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可行的计划，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陈云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前往上海筹备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的财经会议。

致周恩来电[1]

（1949年7月21日）

据张表方本日称，龙云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李达去湖南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的批示[1]

（1949年7月21日、26日）

一

据李六如[2]本日称，李达愿任教育厅长，但尚无人正式通知他。请周考虑即决定李达任湖南教育厅长，并通知他早日去湘接管学校。

二

已和李达谈过，他愿意去湖南工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将中共湖南省委致中央组织部的一份电报批送周恩来时的批示；本篇二是26日毛泽东收到李达来信后，给周恩来的批示。

[2] 李六如，当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1]

（1949年7月22日）

英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矛盾，我们应当利用这个矛盾。请你们在确定的一般原则下在运用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的主要内容。

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等电[1]

（1949年7月23日）

我们认为华东局指出的各点是一切地方都应当注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请转发下级唤起注意。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转发华东局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电的主要内容。

对举行平凉战役以及西进作战的意见

（1949年7月23日）

德怀[1]同志：

午哿电[2]悉。打胡[3]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4]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5]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定购大批汽车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购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49年7月20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一）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约5万人。（二）为解放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请向某方订购汽车1000至2000辆，供西北军用。（三）宁夏卢忠良、青海马继援各率三军准备退守平凉、陇县、泾川地区，配置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10个军，26日开始攻击。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马，指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和副长官。

[5] 辰兄，指苏联。

来后，经东北、华北转至西北，然后我军利用这批汽车进军新疆，如此则时间可能拖得长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种是利用现在少数汽车及从兰州、西宁可能缴获之车辆即行入疆，到达后再从伊犁方向输入汽车及其他工业装备，如此则时间可以缩短。究以何者为宜，请加斟酌电告。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1]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此事请于平凉战役结束后与王震[2]等同志商酌，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

午梗

---

[1] 平凉战役，即陇东追击战。1949年7月扶眉战役后，第一野战军决心乘胡宗南、马步芳两部彼此远离之机，以第十八兵团主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青宁“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州地区。7月21日至24日，我军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地区出动。同月24日，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于陇东布防，企图阻止第一野战军沿西兰公路挺进甘肃、宁夏。但马步芳、马鸿逵为保存各自的实力，在我军主力尚未迫近时即分别后撤。我军乘机向陇东实施追击，至8月10日，歼敌万余，解放了陇东广大地区。

[2] 王震，当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赓邓华两兵团在湘赣粤的行动计划[1]

（1949年7月24日）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2]及方方[3]：

各电均悉。（一）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4]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二）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三）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余、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5]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宋，指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第三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张、李，指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

[4] 陈赓邓华两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陈赓和邓华。

[5]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和北平市市长。张云逸，原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此时已决定调华南分局工作。

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干部配备，争取和余汉谋[1]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广东问题，货币问题，外交政策（主要是对香港），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这个会议的时间应不迟于九月五日，请方方按时赶到赣州。林平[2]及其他什么人应到会，由方方决定。方方须提早结束闽粤赣边区工作的处理。（四）江西省委对接收赣州及赣南各县的准备工作，须迅速完成。（五）赣南国民党军沈发藻[3]等愿意脱离江西省主席方天，站在我们方面，江西省委及十五兵团留赣南工作之一个军须注意接洽联络，争取和平接收赣南及改编赣南敌军。（六）从目前起的一个半月内，即在九月中旬以前，四野主力各部争取进到醴陵、攸县、湘潭、湘乡、宁乡地区，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以便在陈邓两兵团由赣南向广州前进时（大约在九月中旬），四野主力能向衡州[4]、郴州地区前进。目前天气极热，可令四野主力缓缓前进，每天走四五十里，走两天三天休息一天两天。（七）以上请林邓萧赵将有关各点，通知陈赓、邓华及江西省委。

军委

午敬

---

[1] 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军广州绥靖公署主任。

[2] 林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沈发藻，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编练司令部司令、第四兵团司令官。

[4] 衡州，即湖南衡阳。

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题词

（1949年7月24日）

纪念民主战士邹韬奋。

毛泽东

毛泽东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的题词。

陈赓邓华等兵团进军地区和路线问题[1]

（1949年7月25日）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粟、唐、周，华南分局：

（一）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2]悉，此电部署甚好，即可照此执行。（二）我们今晨发给你们一电，与你们此电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在该电中说，四野主力应争取于九月中旬以前到达攸县、湘乡及其以北各地。现距九月中旬尚有一个半月，你们照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部署休整，过三伏后再进，九月中旬以前是可以达到攸县、湘乡之线的。并且你们已令各兵团派遣先遣师进得更远，便于尔后主力的推进。（三）方方来电要求入粤我军有一路经三南、和平、河源出惠州，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在九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队外，陈邓两兵团主力不要超过五岭[3]界线。自九月中旬起，准备陈兵团经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指1949年7月23日24时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湘赣主力部队决在三伏内不作大的行动，各军进至指定地点休整。为扩大占领区及利于尔后之进军，各兵团均须派出先遣师，压迫敌人东退，以减少敌人对新区的抢掠及破坏。各先遣师应特别注意筹粮及修复道路。

[3] 五岭，指湖南、广东、江西、广西交界处的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五岭。

化南雄两路出北江，先占韶州[1]；邓兵团可经翁源、连平、和平分两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东江，先占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干部，调整兵力，然后两兵团配合广东我军会攻广州（估计此时广州余汉谋[2]等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但九月五日，方方必须到赣州与叶张陈邓[3]会合，商筹全局。（四）韩江流域之胡琏、喻英奇[4]等部敌军，责成叶飞兵团[5]派一个军由漳州出潮汕[6]去帮助解决。邓华兵团不派兵出韩江。因邓部入粤只有两个军，占领广州后，主力应位于广州地区，一部在惠州，一部在韶州，一部出南路，不可能兼顾韩江。而陈兵团则须出广西。（五）方方要求派队解决会昌、寻乌地区之敌，这可由邓华留在赣南之一个军负责办理。

军委

二十五日上午七时

---

[1] 韶州，即今广东韶关。

[2] 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军广州绥靖公署主任。

[3]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和北平市市长。张，指张云逸，原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此时已决定调华南分局工作。陈，指陈赓。邓，指邓华。

[4] 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十八军军长。喻英奇，当时任国民党军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

[5] 叶飞兵团，指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

[6] 潮汕，指广东潮州和汕头。

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1]

（1949年7月25日）

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负担为适宜。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

[1] 这是毛泽东复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代表团，于6月21日自北平启程访问苏联，26日到达莫斯科。

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1]

（1949年7月26日）

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使情况改善。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23日关于部队疾病情形严重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转发方方、魏金水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的批语[1]

（1949年7月27日）

请你们考虑邓华出三南之先遣师即由三南出梅县，配合当地我军歼灭胡琏部。该敌只有一万二千人，战斗力弱，我有一个师配合当地我军，可以解决该敌，然后直下潮、汕。

[1] 毛泽东将方方、魏金水21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转发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陈赓、邓华。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批语。

为戏曲改进会发起人大会题词

（1949年7月28日）

推陈出新。

毛泽东

关于刘少奇可先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致刘少奇、王稼祥电

(1949年7月31日)

刘、王：

午陷各电均悉，答复如下：（一）少奇可先回国，留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完毕，于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二）新华社派代表驻莫斯科及塔斯社派代表驻北平，均同意。时间可定在九月政府成立后，人选准备亦要那时才能办好。（三）此外，我认为阿洛夫、米大夫[1]二人仍以留在中国工作为好，因为他们对中国情况已相当熟悉，他们已学了许多中国话，他们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的某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惟他们须统一在柯兄[2]领导之下，**或留阿洛夫而米大夫不再来**[3]，此事是否可行，请与柯兄商酌办理。

AH[4]

午世

---

[1] 阿洛夫，指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是来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医生，并担任中共与联共(布)的联络工作。米大夫，指米尔尼柯夫，苏联著名内科医生，1945年12月来中国帮助工作。

[2] 柯兄，指柯瓦寥夫，当时担任来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组负责人。

[3] 此处楷体字排印的是周恩来修改时所加的内容。

[4] AH，毛泽东的代号。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的手稿。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1]

（1949年7月31日）

一

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从这次起义到现在，业已二十二年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是中年了。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是老年了。但是革命则终于胜利了。

二

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二十二周年而写的社论稿时加写的三段话。本文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

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

现在全国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深切地信赖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但是有些新解放区的人民（其中包括好心的热忱的知识分子），在天灾人祸和敌人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和个人生活困难面前感到了惶惑，这是因为他们还是刚刚被解放，还没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克服困难的斗争经验。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实行封锁政策的条件之下，还须加上一条疏散人口的工作。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年的斗争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经验和信心，只须共产

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明了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质，坚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策，我们就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手稿（部分）。

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年的历史经验[1]

（1949年7月）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时加写的一段话。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在北平香山。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在北平香山。

1949年7月，毛泽东和韩桂馨、李云露在北平香山。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在北平香山。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及身边工作人员等在北平香山。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看照片。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

1949年，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徐肖冰、侯波合影。

中央关于华南分局、华中局、西南局的干部配备及其管辖范围的指示

（1949年8月1日）

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

午陷电悉。

（一）广西成立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委员人选尚未定。其他干部，华中局及中央各准备一部分，华南分局应准备一部分。

（二）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潮梅、东江、北江、南路、中区等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

（三）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委员人选待剑英、云逸与方方见面商量拟定后，报告中央考虑决定。

（四）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

（五）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正规军九十万人）。华中局现在武汉，将来可能移至长沙。

（六）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

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三个军，第一步协助邓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协助四野五个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军（共八个军）入广西打白崇禧的作战中，华南分局有以广东的财力、物力及干部协助解决广西问题的任务。

（七）在福建省委接收闽西、闽南，江西省委接收赣南，湖南省委接收湘南，云南省委（陈赓等）接收云南之后，原受华南分局领导之各该省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即归入各该省委及军区领导，华南分局届时应指示各该省负责同志妥善接受新的领导，并使各地工作顺利进行。

中央

未东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华南分局、华中局、西南局的干部配备及其管辖范围的指示》的手稿。

为《河北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8月1日）

河北日报

毛泽东为《河北日报》题写的报头。

[1] 1949年6月，华北全部解放，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并开始筹办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为了便于区别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并祝贺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创刊，毛泽东第二次题写了《河北日报》的报头。

为《唐山劳动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8月1日）

唐山劳动日报

毛泽东为《唐山劳动日报》题写的报头。

[1] 《唐山劳动日报》是中共唐山市委机关报，创刊于1940年1月1日。原称《救国报》《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冀东日报》《新唐山日报》。1949年8月1日毛泽东亲笔题写“唐山劳动日报”报头后，更名为“唐山劳动日报”。

复粟裕等电[1]

（1949年8月2日）

同意三十日电意见，张爱萍[2]海军系统暂时不迁青岛，并仍归华东系统即归粟裕指挥。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人民海军初创人员。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并告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2] 张爱萍，当时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1]

（1949年8月2日）

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陈明仁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问题致东北局电

(1949年8月3日)

东北局：

七月三十日电悉。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在你们提出的四十二人中，除李六如、徐寿轩准备调离东北工作，及拟从陈龙和汪金祥两人中调出一人来中央工作外，其余三十九人我们均同意。但在此三十九人中，非党人士仅占四人，太少了[1]，应再补充几位党外人士，如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可留若干空额，俟政协会后，可考虑从此间派些民主人士去。此点很重要，应使党外民主人士不少于五分之一，如有四分之一则更好，希你们加以研究，并将结果电告，以凭最后决定。

中央

未江

[1]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复刘少奇、王稼祥电[1]

（1949年8月4日）

我曾以甘新路上的情况及何时可以向新疆进军电询彭德怀。接彭八月三日复电说，“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即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进取新疆的时间问题复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

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1]

（1949年8月4日）

我们完全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兄[2]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请柯兄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

---

[1] 这是毛泽东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

[2] 柯兄，指柯瓦寥夫，当时任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1949年4月从东北到达北平，后接替阿洛夫负责中共与苏共的联系。

对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的批语

（1949年8月5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的同志们：

现在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负责人刘澜涛、胡锡奎二同志写的该校对于一万二千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种经验。假如你们同意的话，请将这个文件转发给你们所属学校的负责同志，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复程潜电

（1949年8月5日）

颂云先生勋鉴：

未江电示敬悉。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持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毛泽东

朱　德

未微

致林彪、邓子恢等电[1]

（1949年8月5日）

我们认为，程潜所提临时机构是必要的，应予同意。毛、朱复程潜电请林、邓即转去，林、邓亦应根据毛、朱复电意旨去电鼓励程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萧劲光、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致华中局等电[1]

（1949年8月5日）

（一）我军接管长沙后，除成立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李明灏应参加为委员）外，湖南省政府及湖南军区两机构不要马上成立，即用长沙军管会名义统一指挥已占各县。（二）我军入长沙，望注意维持良好秩序，极力注意做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人物中的工作，尊重他们，给他们以起义者的待遇，帮助他们进步，团结多数，打击反动分子。以便经过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顺利地接管全省政权及改编陈明仁军队为人民解放军。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电的主要内容。

争取程潜[1]等站在我们方面有极大的政治作用

（1949年8月6日）

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

（一）林邓五日十二时电[2]悉，处置甚好。

（二）我军入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以便利用这种报纸，登载我们的消息及文件，分化程潜、陈明仁[3]系统中的党、政、军，给进步分子以武器，教育和争取多数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同时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

---

[1] 程潜，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

[2] 指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1949年8月5日12时给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政治委员金明、唐天际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目前不要急切地进行对陈明仁的斗争，而以热烈的团结为主，便于今后商谈一切问题。政权要其逐步移交，名义上推迟一个月。岳麓山的控制和长沙部队的指挥关系，如目前不能立即解决，待见面后逐步解决亦可，但必须达到解决的目的。

[3] 陈明仁（1903—1974），湖南醴陵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4日和程潜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

（三）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即进行物色，并拟定名单电告。

（四）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1]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

（五）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惟暂不对外透露，看一看程潜及其一派人的表现如何，再作决定。

中央

未鱼

[1]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额尔德尼等[1]

（1949年8月6日）

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的节录。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十世班禅，青海循化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各种原因，西藏上层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于1923年被迫离开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避居内地，因西藏地方当局阻挠，一直未能返回西藏，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去世。1949年6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继位后，仍留居青海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望西藏早日解放。鉴于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历史地位和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意愿，和为了促进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支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西藏。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西藏的准备工作和护送工作。1951年12月29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从青海西宁起程，于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6月8日回到后藏日喀则。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

（1949年8月6日）

德怀[1]同志，并贺、习[2]：

（一）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你们准备如何部署？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3]。

（二）关于绥远[4]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张治中，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治中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傅作义、邓宝珊，原分别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和副总司令，1949年1月他们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4]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1]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2]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3]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办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三）马鸿逵[4]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5]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

---

[1]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2] 董其武（1899—1989），山西河津人。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6月与华北人民政府签订绥远和平协议，9月19日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通电起义。

[3] 姚喆（1906—1979），湖南邵阳人，当时任绥远军区司令员。王平（1907—1998），湖北阳新人，当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4]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5] 马如龙（1893—?），宁夏河州（今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宁夏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1]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2]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四）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3]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五）陶峙岳[4]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5]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6]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

[1] 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杨得志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

[3]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青海循化人。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4] 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率部起义。

[5]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当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6] 指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

（六）过渡机构存在时间究有多久，暂不作硬性规定，以便利解决反动军队及反动政权，便利解决土地问题及民族问题为原则。

（七）胡公冕[1]已来西安，请你们注意用他去收拾胡宗南[2]部。现在程潜、陈明仁[3]已在湖南起义加入我方，对蒋、桂、胡[4]各部必有影响，给我们以分化各部的机会。

（八）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5]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九）以上各项是否可行，请加考虑提出意见为盼。

毛泽东

午鱼[6]

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邓张李，华东局及粟裕[7]。请你们注意研究此项问题，并应用此项方法于湖南等处。毛又及。

---

[1] 胡公冕（1887—1979），浙江永嘉人。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从事秘密兵运工作。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 程潜，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宣布起义。陈明仁，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4日与程潜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

[4] 蒋、桂、胡，指蒋介石和桂系首领、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以及胡宗南。

[5] 彭，指彭德怀。

[6] “午鱼”，应为“未鱼”，即8月6日。

[7] 粟裕，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复刘少奇、王稼祥电[1]

（1949年8月7日）

同意中国大学[2]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

[1] 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根据刘少奇与斯大林的口头协议及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中苏双方议定：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由苏方选派200余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苏联帮助在东北办一所空军学校和一所海军学校，并由刘亚楼、张学思在苏联具体商谈；帮助创办一所大学。这是毛泽东复刘少奇、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

[2] 中国大学，即后来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

复华东局电[1]

（1949年8月7日）

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华东局关于上海市人民政府3日至5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方方等电[1]

（1949年8月8日）

叶剑英八月九日由北平动身，经汉口转江西，九月五日前到达赣州。方方务须于九月五日到达赣州。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方方赴赣州参加华南分局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方方并告华中局及陈赓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解决河南土地问题[1]

（1949年8月10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六日电及转来河南省委八月一日电均悉。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2]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除上述一点外，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完全掌握全部农村运动的领导，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出现。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但就在此准备期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省委、区党委必须完全掌握农村工作的领导职务，千万不要放松此种职务。一切重大决定，均须事先报告中央，获得批准然后实行。

八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

[2] 指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给杨开智[1]的信

（1949年8月10日）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2]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3]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八月十日

---

[1] 杨开智，湖南长沙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 岸英，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岸青，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3] 展儿，即杨展，杨开智之女。

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1]

（1949年8月11日）

同志们：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2]以来，已经有一年了。那次大会规定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纲领和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实现的。一年来整个形势有很大变化，要求我们做很多的工作。这次工会工作会议要解决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我们有许多经验，有做得好的经验，也还有做得不好的经验。立三[3]同志说，我们工作中有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和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今天我国有将近二千万的职工大军，但组织起来的太少。老解放区工会发展很少，新解放区刚才开始。除了破坏分子及资本家外，一切职工，即使政治上落后的人，即使国民党工会的工作人员，只要有改造可能的，都应包括在工会组织之内。对于落后的和犯错误的人，应当采取团结和教育的方针，从团

---

[1] 这是毛泽东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2]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大会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联合全国各阶层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等问题，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会议并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

[3] 立三，即李立三，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我们在工厂中便会是少数，便会孤立。当然，破坏分子是不允许加入工会的，甚至一部分作恶有据的还要逮捕。我们对他们不加警惕是要犯错误的。开门是向着进步的工人、不很进步的工人和落后的工人（包括过去有毛病而有希望改造的），这样我们便有了充足理由去孤立反动派。国民党表面上是被打倒了，但实际上还没有被完全打倒。他们组织一贯道等会道门，在安徽、河南一带就有十万人。在工人中也有隐藏的坏分子反对我们。如果采取关门主义，便不能够孤立他们。正确的方针是争取中间派，落后分子也要尽可能争取过来。

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应该抱主动的态度，主动地和资本家搞好关系，和行政搞好关系（对厂长方面也应该强调主动，如像《桥》里面的宋厂长那样[1]）。党、政、工三方面，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好生产，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呢？你们要做宣传工作，要向市委书记、市长做宣传工作，也要向我们做宣传工作，因为我们照顾的方面很多，不能像你们专心搞一门。

主动地团结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主动地搞好同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

---

[1]　《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拍摄完成的一部故事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东北解放战争中工人阶级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修复被破坏的松花江铁桥的事迹。影片中的宋厂长充分依靠群众，发动大家想办法，使遇到的各种困难逐一得到克服。

复周世钊电[1]

（1949年8月11日）

虞[2]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世钊电的主要内容。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 虞，即7日。

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49年8月13日）

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以北平的情况来说，大约几个月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

全北平的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复陈明仁电

（1949年8月13日）

长沙湖南省政府陈主席明仁勋鉴：

未文电敬悉。湖南举义，遐迩欢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领导有方，为功极大。贵主席主持之过渡时期省政机构极为必要，仍应行使职权，借维秩序，并利号召。尚望贵主席团结所属，再接再厉，弟等则嘱中共人员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推诚合作，以利革命事业之推进。至人民省政府之建立，当俟军事有进一步发展，并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商酌，然后办理，较为适宜。贵主席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教。

毛泽东

朱　德

未元

毛泽东、朱德复陈明仁电的手稿。

为《铁军报》题写报头[1]

（1949年8月13日）

铁军报

毛泽东为《铁军报》题写的报头。

[1] 1948年10月15日，铁道纵队政治部创办纵队党委机关报——《铁军》报。1949年5月6日，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由滕代远兼任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将《铁军》报改为铁道兵团党委机关报，并决定更名为“铁军报”。滕代远请毛泽东题写了报头，于8月13日开始使用。

给胡乔木的信[1]

（1949年8月13日）

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

[1] 这是毛泽东致新华社社长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复华东局电[1]

（1949年8月14日）

（一）二千四百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二千四百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四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十一月起还本付息，三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请对发行公债问题加以说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

（1949年8月14日）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

[1] 本文和《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4篇文章，都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

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

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

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针对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5篇评论，都收录在《评白皮书》中。图为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评白皮书》（部分版本）。

复程潜、陈明仁等电[1]

（1949年8月16日）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暨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八月五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

---

[1] 1949年8月5日原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副主任唐星、李默庵，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傅正模、刘进等发表起义通电。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他们的复电。

致陈云等电[1]

（1949年8月17日）

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我们。

[1] 8月15日，陈云复电中央，对发行公债的数额、用途、利率和还本付息的时间等问题作了说明。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陈云并告饶漱石、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别了，司徒雷登[1]

（1949年8月18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

[1]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

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1]。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

---

[1]　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

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

欧洲马歇尔计划[1]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2]。

---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6月5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7月，英、法、意等16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2]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个民间传说。据传周朝姜太公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3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钩来！”（参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嗟来之食”，是指一种带侮辱性的施舍。齐国的一个饥民因为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故事，参见《礼记·檀弓下》。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1]。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2]。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3]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

---

[1]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1943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2] 朱自清（1898—1948），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文学家、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1948年6月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当时他的生活非常困苦，这年8月12日终因贫病在北平逝世。在他逝世以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

[3] 参见《老子》第七十四章。

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致阿哈买提江[1]电

（1949年8月18日）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北平

---

[1] 阿哈买提江（1914—1949），新疆伊犁人。是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的领导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49年8月27日赴北平参加新政协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给江庸[1]的信

（1949年8月19日）

翊云先生：

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俊人[2]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先生事[3]，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率复。敬颂

道安！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

[1] 江庸（1878—1960），号翊云，福建长汀人，法学家。1949年春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等以私人资格北上同中国共产党商议和谈问题。同年秋，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2] 颜俊人，即颜骏人（1877—1950），名惠庆，上海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和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驻苏大使。1949年秋，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3] 指江庸向毛泽东推荐法学界的许藻镕一事。

毛泽东致江庸信的手稿。

中央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规定[1]

（1949年8月19日）

各中央局、分局：

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兹规定：

（一）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

（二）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

（三）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

（四）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六个月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加。

（五）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

（六）此指示转达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勿误。

（七）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中央

八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和分局的电报。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9年8月20日）

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2]。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2] 该命令中说：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

致东北局电[1]

（1949年8月21日）

请你们加以注意，使上海民族资本家有出路，并将东北过去及现在与友方交换物品的品名、数量电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复彭德怀等电[1]

（1949年8月22日）

十九兵团何时向宁夏进军，待占领兰州后看情况决定。如果王震四个军确有把握占领青海，则十九兵团可在兰州休息十天或半月后即向宁夏，否则可略为推迟。入新疆部队至少休整一个月，必要时酌量增加休整时间，好作充分准备。入川部队待与贺面商后作最后决定，大体上以十八兵团入川是适宜的。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1]

（1949年8月22日）

彭、张，并西北局：

傅作义、邓宝珊定于廿三日由北平动身去绥远。约定他们到绥远后，以两星期时间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傅、邓回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会后傅去绥远实行改编军队及政权系统，邓去甘肃。

邓去甘肃的问题，已约定待贺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与邓见面谈好后，随贺一道去西北，张治中也须那时才能去西北。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张宗逊并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AAA 加等 华东局，中南局，华北局，东北局。
671
等級 AAA
發 彭德怀，西北局。
檔案批發
未No.910　No.　未No.896
附註 毛主席批发。及有关傅部等
內容 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
（电报八）
彭德怀，并西北局：傅作义部已开到张家口地区，我决定在张家口地区与傅作义部谈判，并邀请绥远方面的代表来张家口谈判。我们准备在谈判中宣布我党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傅部可参加政协会议。会后傅去绥远，傅去绥远时，我军实行改编军队及政权系统，部去甘肃。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的手稿（部分）。

贺美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电[1]

（1949年8月23日）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和但尼斯同志：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热烈庆祝美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分子，在美国反动势力高压之下，为着国际和平，为着美国工人和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着中美人民的真诚友谊，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重要的鼓励和援助。美国的未来，不属于外强中干的美国反动势力，而属于你们和美国人民。庆祝你们和美国人民的奋斗得到成功，庆祝中美两国工人阶级和两国人民的团结继续增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1]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福斯特，祝贺美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

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1]

（1949年8月23日）

彭、张，并贺、习[2]：

各电均悉。（一）马步芳[3]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4]。王震兵团[5]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二）同意在定西或兰州开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请你们计算时间，贺龙同志如能于九月十五日赶到北平参加政协（政协准备九月十日开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等的电报。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攻兰战役，即兰州战役。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8月21日发起兰州战役，26日解放兰州。第一兵团于临洮、临夏等地歼灭马步芳部新编骑兵军后，挺进青海，9月5日占领西宁。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2万余人，马步芳部基本被歼。

[5] 王震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

二十日闭幕，贺于十五日到，可参加会议的一半），即可偕仲勋一道去兰州附近开会，惟路上须带充分的护卫武装，并须保守机密为要。（三）贺来北平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1]商量入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2]一道去西北之必要。（四）西北局须准备移至兰州，将来西北人民政府须建立在兰州。

中央

未梗

[1] 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2] 邓宝珊，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的手稿。

给黄炎培的两封信

（1949年8月24日、26日）

一

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1]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1949年8月24日发表的驳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白皮书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二

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给胡乔木的信[1]

（1949年8月24日）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1] 这是毛泽东在阅读1949年8月2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发表痛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后，致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复东北局电[1]

（1949年8月24日）

据华北经验，政府机构中设人民监察委员会置于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对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大好处。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同意对东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调整及分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27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林枫兼监察委员会主任。

复王首道等电[1]

（1949年8月24日）

八月二十一日电收到。我们欢迎此类简单明了的报告，而不欢迎冗长的沉闷的报告。

[1] 王首道8月21日给毛泽东、林彪、邓子恢的报告全文如下："一五八师（原属四十六军）已归长沙分区。一六〇师（原属四十七军）已归常德分区。一六二师（原属四十九军）已归益阳分区，现尚在河南。"这是毛泽东收到王首道的报告后，复王首道并告林彪、邓子恢电的主要内容。

不论新区、老区均须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1]

（1949年8月25日）

华中局，并告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

（一）八月二十日电悉。望将各城各界人民代表会经验扼要电告。

（二）务须催促各城开会每月至少一次。

（三）各县应开县各界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可以选择若干开明绅士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两天至三天开完。此事华东、华中、西北、南方各新区均可做。各老解放区更不待说。

中央

未有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中局等的电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等电的手稿。

对攻打兰州的几点意见[1]

（1949年8月26日）

彭、张，并告贺、习[2]：

二十四日电[3]悉。（一）如你们二十五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二）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三）如二十五日不得手，则请照你们二十四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打城。如此，则须令对城防御之四个军或三个军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并须预计打援及攻城两战所必需的充分的时间，估计至少要半个月，多则可能要一个月或更多时间。（四）为了要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粮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8月24日21时彭德怀、张宗逊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遵照8月23日电示，决以3个兵团打兰州。宁夏马鸿逵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可能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再加周嘉宾、黄祖勋两部，共有13万兵力，据城坚守，我即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弹接济困难，不能持久，故决定乘马鸿逵部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海马步芳主力。如未解决青马军，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中5个军打宁马。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25日晨开始攻击。

及由西安接济食油、弹药及棉衣，请令十八兵团用全力向胡宗南[1]军所在的空隙地区举行袭击，确保天水及西兰公路[2]，以利运输。同时，在兰州附近周围二三百里区域有计划地筹措粮食。请西北局全力支援兰州前线的需要。

军委

二十六日一时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2] 西兰公路，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8月26日）

华东局，并告各局，各野前委：

未敬[1]电悉。

（一）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除将你们电报转知各局、各野外，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 未敬，即8月24日。

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

（二）各县要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办法照中央最近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1]办理。要各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办理，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此项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无须待乡村农会建立然后举行。举行此项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经过此种会议去发动农民群众。

（三）上述两项请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西北局、华中局、华南分局一律遵照办理。各野前委注意研究和协助。

中央

八月二十六日

---

[1] 指毛泽东1949年8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县均应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指示要求新老解放区各县每月或每两月至少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200余人，中县代表100余人，小县代表数10人，每次2至3天开完。

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给彭真[1]的信

（1949年8月26日）

彭真同志：

八月廿四日的报告收到阅悉，很高兴。已转各中央局参考。

请你将此报告抄一份送给黄敬[2]同志看一下，并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他写一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给我，同时抄给华北局。

毛泽东

八月廿六日

[1]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2] 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彭真同志：

八月十四日的报告收到了，很高兴。已转发中央参考。

请你将此报告抄一份送给黄克诚同志看一下，并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他写一篇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给我，用蔡畅同志的信。

毛泽东 八月廿六日

毛泽东致彭真信的手稿。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致东北局等电

(1949年8月26日)

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刘、邓、张、李[1]，华中局，西北局：

兹将彭真同志关于今年五月至七月的北平工作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作为研究材料，其中有些经验是各地可以采用的。

中央

未宥

[1] 刘、邓、张、李，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

毛泽东致东北局等电的手稿。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8月26日）

（一）完全同意二十五日二十四时电的部署[2]。（二）六十二军暂留临夏，必要时亦宜令其移兰州参战。（三）务请注意筹足至少一个月的粮食、弹药，准备持久坚决歼灭两马。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彭德怀25日24时电告：攻城部队25日拂晓对兰州守敌发起攻击，与敌恶战一天，敌我伤亡相等。马鸿逵部4个军8万人左右，正倾巢援兰州，似有放弃宁夏模样，如能经过傅作义迟延宁马10日或半月出动，对我有利。根据上述情形，我军拟留六十二军停临夏，一、二两军东移，参加攻击兰州之敌及便于适时打击增援兰州的宁夏马鸿逵部。

致傅作义电[1]

（1949年8月26日）

我军正攻兰州，马鸿逵有向兰州增援模样。毛主席意见，如有可能，请兄电劝马鸿逵勿去增援，准备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如去增援，则马部和平解决机会将更少了。

[1] 这是毛泽东应彭德怀来电要求起草的以聂荣臻、薄一波名义致傅作义电的主要内容。

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

（1949年8月27日）

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而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则集中。

[1] 这是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的一段讲话。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1949年8月28日）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

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一九四

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郎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1]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

[1] 华盛顿（1732—1799）、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的殖民地起义军队总司令，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曾任美国总统。林肯主张废除美国的黑奴制度，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领导了反对美国南部各州奴隶主的战争（1861—1865），并在1863年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接见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人员。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张治中在北平火车站迎候由上海北上的宋庆龄。

1949年8月，毛泽东和老朋友柳亚子在一起。

给吴玉章[1]的信

（1949年8月29日）

玉章同志：

来信[2]已悉。当付郭、茅、马[3]三先生审议，提出意见。现已接复信，特付上，请予考虑，并请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付范文澜、成仿吾、黎邵西[4]三位一阅，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为盼！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

[1] 吴玉章，中国文字改革的倡导者之一。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

[2] 指吴玉章1949年8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信。

[3] 郭、茅、马，指郭沫若、茅盾、马叙伦。

[4] 范文澜，当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当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黎邵西，即黎锦熙，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

致华中局电[1]

（1949年8月29日）

野司转来四十三军病员情况的电报已阅悉，甚为怀念。未知其他各军是否也有相似的情形。你们是否已采取统一的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即是说是否需要推迟进军的时间，以便使部队多得休息，及是否需要普遍增加伙食费，使战士恢复体力，请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询问第四野战军的病员情况及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各中央局、分局电[1]

（1949年8月30日）

（一）兹将华北局未俭电转给你们。请你们仿照此电，将你们区域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列举出来，指明哪些已开过各界代表会议，哪些还未开，会议开得好还是不好，你们处置如何等项报告我们。（二）老解放区村、区、县、省等级人民代表会议开会情况如何，新解放区县的各界代表会是否可以举行，均望电复。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分局并告各野战军电的主要内容。

“友谊”，还是侵略？

（1949年8月30日）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1]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

[1] 这里所说的“治外法权”，是指领事裁判权。

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1]。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2]。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3]。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

---

[1]　《望厦条约》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美国利用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处境，强迫中国清朝政府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这个条约共三十四款，其中规定美国享受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除割地、赔款外所获得的一切特权，包括美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

[2]　材料引自美国雷麦著《外人在华投资》一书第十五章。

[3]　指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平和南京的汇文中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

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1]，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〇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

---

[1] 1946年12月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这个事件，曾经激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怒，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1月，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抗议，竟将主犯皮尔逊交给美国方面单独处理。同年8月，美国海军部宣布皮尔逊无罪释放。

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1]

（1949年8月30日）

彭、张：

看你们二十九日致王张[2]电，知马[3]匪分两路退却，且有退新疆可能。我们亦从伊犁方面获得同样消息。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军委

未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王张，指王震、张希钦，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和副长官。

关于欢迎出席新政协会议致程潜[1]电

(1949年8月30日)

长沙程颂云先生：

八月十九日电示今日收到，敬悉。尊见极好，完全同意。当接陈子良[2]兄未皓[3]电时，我即复电（经中共湖南省委转）请他仍照前议兼领省主席，与尊意吻合。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我公及仇亦山[4]、陈子良出席，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

毛泽东

未卅

---

[1] 程潜，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

[2] 陈子良，即陈明仁，号子良，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4日与程潜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

[3] 未皓，即8月19日。

[4] 仇亦山，即仇鳌，原任国民党政府湖南省政府委员，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解放工作。

毛泽东致程潜电的手稿。

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8月）

人民日报

毛泽东第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的报头。

[1]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改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毛泽东第三次挥笔题写“人民日报”，即今天所用的报头。

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以利我军歼灭之[1]

（1949年9月1日）

林、邓、萧、赵：

三十日电[2]悉。（一）你们歼灭宋希濂[3]的计划是很好的。（二）程子华[4]兵团主力在澧州[5]、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6]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7]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指1949年8月30日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白崇禧已改变在湘西寻我作战的计划。宋希濂已令所部出发，向石门、澧县、常德进攻，但该敌仍有中途改变计划的可能，而无论该敌是否前进，我军均拟攻歼该敌。

[3]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4] 程子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5] 澧州，即湖南澧县。

[6] 黄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员。

[7]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劲光[1]、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2]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3]，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军委

申东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以利我军歼灭之》的手稿。

---

[1] 萧劲光，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宝庆、衡州，即湖南邵阳和衡阳。

[3] 粤汉全路，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为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纪念题词[1]

（1949年9月1日）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意！

[1] 1949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为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题写挽词，周恩来致悼词。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为冯玉祥将军在泰山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

（1949年9月2日）

同意你们未世亥电作战方针，占领青海、宁夏及永登休整一时期再分兵西进。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1949年9月3日）

饶漱石[1]同志：

陈云[2]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3]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2]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并主持工作。

[3] 上海会议，指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于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的财政经济会议。参加的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具体措施和步骤。

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办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此种会议，城市最好每月开会一次或三月开会两次，各县似以两月开会一次为宜。新区各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考虑选择上海附近一二个县亲自领导，开一二次会试试。以上各点，请以你的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申江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9月4日）

向青、宁进军以适合情况解决问题，不使军队太疲劳为原则，早一点迟一点都可以。宁夏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请考虑利用马鸿宾[2]，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宁夏人少地狭，马部军政党可能有二十万人，加上十九兵团十万人，粮食问题必甚严重，请预为筹备。

---

[1] 9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电，询问是否可于9月15日以前占领青海、宁夏。3日，彭、张复电说：15日占西宁有可能，9月底能占宁夏省会。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2] 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批语[1]

（1949年9月）

一

乔木[2]：

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毛泽东

九月三日

你应注意睡眠。

---

[1] 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写了一些批语，这些文献资料没有全部保存下来。这里选入的5次批语，只是一个侧面的反映。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这5次批语都是写给他的。

二

乔木：

今[1]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毛泽东

即

三

即刻付印，一小时内交我。

毛泽东

四

照此[2]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毛泽东

九月六日

---

[1] 指1949年9月3日。

[2] 指经毛泽东1949年9月6日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修改的底本是纲领草案（1949年9月5日，初稿）铅印件。

五

乔木：

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送交周副主席[1]。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1000份。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下午四时半

[1] 指周恩来，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

（1949年9月4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前委：

（一）华北局转来察哈尔省委未世电[1]报告该省各界代表会的经验，很值得注意，请加研究。

（二）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

（三）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

[1] 指中共察哈尔省委1949年8月31日关于该省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报告说，张家口解放初期未注意开各界代表会，工作走了弯路，从今年4月至8月，已开各界代表会4次。大同于今年5月初解放后，至今已开会3次。宣化仍未注意开代表会，继续用党内扩大的干部会议去传达和布置工作。已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对于联系城市各界人民，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启发各界人民的积极性，共同建设城市，均起了相应作用。缺点是存在形式主义，准备不足，缺乏中心内容，民主讨论不够。今后要使张家口、大同的代表会提高一步，会议代表的产生改以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聘请和推派为辅，并注意克服以往的不足。宣化立即着手建立代表会。人口在2万左右的城镇，亦拟建立各界代表会议。各县按照群众基础不同分别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界代表会议。区村两级建立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

（四）在新解放区，各界代表会的开始若干次，代表的产生可以推派和聘请为主，由可靠民众团体的民主选举为辅，以后，即可改为由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推派和聘请为辅。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

（五）二万以上不足三万人的城镇，亦可开各界代表会。

（六）尚未彻底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三级，均开各级代表会议，乡村开农民代表会议，而以县的各界代表会为中心。

（七）已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乡四级，均开人民代表大会，但在开始若干次，亦可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过渡。

（八）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九）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能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则更好，但不要每次都如此。

（十）此电请转发各市、各县，各军、师。

中央

九月四日

给周恩来、聂荣臻的信[1]

（1949年9月4日）

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程潜来京及到京后的具体安排计划致周恩来、聂荣臻信的主要内容。周恩来当即提出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人到车站迎接。8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会见并宴请程潜。

致陈明仁电[1]

（1949年9月5日）

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邀请陈明仁参加新政协会议致在长沙的陈明仁电的主要内容。10日，陈明仁到达北平，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欢迎。

在审校《共同纲领》草案时改写的三段话[1]

（1949年9月6日）

（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的地方政府及军事集团，如有愿意停止战争，承认错误，要求和平解决者，可以按照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大意，用和平方法解决之。

（二）鼓励并欢迎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爱国分子及国民党残余力量统治区域的人民群众组织响应人民解放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国家财产的工作。

（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权机会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

[1] 1949年9月29日正式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二章“政权机关”第十二条中，采用了毛泽东改写的第三段话。

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

（1949年9月7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三十日电悉。同意你们所提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1]，并将此电转发各局、各野研究照办。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

---

[1] 中共中央华中局在1949年8月30日关于召开县的代表会议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是：一、只由县级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两级可开农代会，逐步达到以农代会做基础，吸收其他学生、妇女及少数工商业者、开明士绅（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二、吸收开明士绅应具备以前中央所规定的条件，并经地委一级批准。三、在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较大县城可以城乡合并召开，吸收本城工人代表参加。若无此条件，则只吸收农民（注意吸收手工业工人）代表，不必为了开会去专事组织乡村工人推选代表，以免分散精力。

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以便孤立反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省委、区党委和地委，必须积极帮助各县县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布置和领导此种会议。这是全县性的会议，县城及各区、各乡及县一级机构，均应有代表，在县委领导下，由县政府召开。这是县的会议，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其余均照你们意见办理。此种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注意收集经验，指导各地，并告诉我们。此电请你们及各中央局转发至县一级为盼。

中央

九月七日

对赣州会议及进军华南的指示[1]

（1949年9月8日）

叶、方、陈、邓诸同志，并告林、邓[2]：

（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3]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4]之线前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的电报。

[2] 林、邓，指林彪、邓子恢，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治委员。

[3] 两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

[4] 宝庆、衡州，即湖南邵阳和衡阳。

白崇禧[1]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2]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

军委

申齐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
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1]

（1949年9月8日）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各线我军连续奏捷[1]

（1949年9月8日）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中共中央委员会顷因各军事前线连续告捷，特致电前线各野战军、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表示祝贺。该贺电称：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及各界人民同胞们：

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大举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除完成第一步计划，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各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及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豫北的残余敌占区，山东的青岛地区，共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以外，又复继续前进，解放甘肃及青海的大部，湖北的一部，湖南的中部、北部，江西全省，福建的大部，渤海的长山列岛，包括长沙、福州、兰州、西宁四个省城及赣州、常德、宜昌、天水诸重镇在内，消灭了大批敌军，解放了广大人民。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我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

---

[1] 这是毛泽东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写成并发出的中共中央给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的贺电。

反动派的后方。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全体人民同胞及各界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其中，有甘肃和青海的回民同胞，和汉人同胞一样，表示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人民解放军。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长途远征，冒着酷热的气候，以无比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解放全国人民、统一全国领土的伟大的神圣的志愿所鼓舞，以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巨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慰问。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军事政治任务，为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各线我军连续奏捷》的手稿。

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1]

（1949年9月9日）

林、邓：

关于进攻部署：（一）陈赓邓华两兵团[2]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3]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4]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5]之黄杰[6]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2] 陈赓邓华两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陈赓和邓华。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程子华兵团，指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员程子华。

[5] 宝庆，即湖南邵阳。

[6] 黄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

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1]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2]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3]、罗城、天河[4]、宜山、思恩、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五）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军委

九月九日

---

[1] 鲁道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八军军长。

[2]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桂林绥靖公署主任。

[3] 融县，旧县名，即今广西融安县。

[4] 天河，旧县名，1952年并入广西罗城县。

复邓力群等电[1]

（1949年9月10日）

如伊犁当局将迪化当局所提问题向我方征求意见时，你可以表示：（一）新疆问题的解决方案各方均可以提出，但最后须取决于北平中共中央；（二）谈判地点在兰州，中共中央的负责代表为彭德怀将军；（三）如迪化当局愿派代表去兰州谈判，我们表示欢迎。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和新疆当局接洽和平谈判事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在新疆伊犁的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复邓力群电[1]

（1949年9月10日）

为了快点与迪化当局接上头，你可以于日内进驻迪化，并迅即架设电台通报。

[1] 这是毛泽东10日8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邓力群电的主要内容。邓力群随即从伊犁秘密前往迪化，同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鲍尔汉、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商谈新疆和平解放问题。

和张治中的谈话

（1949年9月10日）

毛泽东：解放军将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叫他们起义为好。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

张治中：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五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泽东：我们已经在伊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犁负责的邓力群。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9月10日）

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由你们自己做准备的事项，请你抓紧进行，除帐篷、水壶、粮食外，你未提皮衣、皮帽、毡鞋，这些是很重要且须立即准备的，是否需要我们帮助你们办皮衣，要多少，请即告。陶峙岳、赵锡光[2]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本日我们邀请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这个电报还提出：应设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5省，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4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兰州或西安；以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2人至3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以为新疆的过渡机关。

[2] 赵锡光，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省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

祝波立特连任英共总书记二十周年的贺电[1]

（1949年9月10日）

亲爱的波立特同志：

中国共产党热烈庆祝你担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二十周年。在你的领导下，英国共产党在二十年来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把自己锻炼成为英国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和英国与各国人民团结友爱的旗帜。中国人民坚决相信，英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英国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是中国人民在英国的最可靠的盟友，英国共产党的强大是世界和平和中英人民合作的重要保证之一。祝你健康，祝你和你的战友们的正义事业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

[1] 英国共产党定于11日庆祝波立特连任英共总书记二十周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表示祝贺。

为《中国儿童》创刊号题词[1]

（1949年9月10日）

好好学习。

毛泽东

[1] 1949年9月，北京出版《中国儿童》（现名《中国少年儿童报》）创刊号，毛泽东题词：好好学习。

毛泽东为《中国儿童》创刊号的题词。

给向振熙的信

（1949年9月11日）

杨老太太[1]：

你们好吧。

现在托朱小姐[2]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衣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

[1] 杨老太太，即向振熙老人，毛泽东的岳母。

[2] 朱小姐，即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

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1]

（1949年9月12日）

邓、张、李，并告林、邓、谭[2]：

申灰电悉。（一）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二）如果白崇禧[3]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4]、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军委

申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和参谋长李达的电报。

[2] 林、邓、谭，指林彪、邓子恢、谭政，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叙府，指叙州府，即四川宜宾。

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及邓小平电[1]

（1949年9月12日）

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及邓小平[2]同志：

请你们研究饶漱石同志这个电报。我认为这个电报所表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们那里可以仿行。

毛泽东

申文

---

[1] 毛泽东的这个电文写在饶漱石1949年9月9日关于上海与华东近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之后。9月12日，在转发饶报告时，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第七点："因陈、刘已赴中央，对华东与上海各方工作均可面达。同时，我因疟疾初愈，请求批准将此电作为我对主席9月份的综合报告。"

[2] 邓小平，当时任第一野战军政治委员。

复饶漱石电[1]

（1949年9月12日）

饶漱石同志：

（一）完全同意你申佳电各项意见和办法。你们这样做，就有了全部的主动权。（二）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报告，此外不须做另外的综合报告。（三）关于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分开及建立华东人民政府，待与陈、刘、粟[2]商量后就可以做，你们可马上进行准备工作。

毛泽东

申文

---

[1] 这是毛泽东对饶漱石1949年9月9日关于上海与华东近况给毛泽东的报告的复电。

[2] 指陈毅、刘晓、粟裕，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复叶剑英、陈赓电[1]

（1949年9月12日）

八日电[2]悉。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叶剑英、陈赓电的主要内容。

[2] 叶剑英、陈赓9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华南分局赣州会议制订的解放广东的作战方案，提出依照中央军委意图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现属韶关市）、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因第四兵团与第十五兵团相隔过远，为求得同时展开，齐头并进，实行钳形合围，必须先行集结预定地区，9月底集结完毕。

致王首道电[1]

（1949年9月13日）

湖南大学教授谭戒甫先生来函称，拟于交通全复时北上观光等语。此人是我过去认识的，教了几十年书，请派人调查其政治背景告我。并向他说明我的意见：交通全复时可以来北平游历一次，仍然回湘在湖大任教，不作在北平久居的打算。如果他是这个意思，我是欢迎他来北平看一看的。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湖南大学教授谭戒甫到北平一事致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复谭戒甫电[1]

（1949年9月13日）

惠函诵悉，极慰平生，交通全复时，倘愿北来游览一次仍返湖大任教，甚表欢迎。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湖南大学教授谭戒甫到北平观光一事复谭戒甫电的主要内容。

给周北峰的信[1]

（1949年9月14日）

一

毛主席说，绥远军政委员会贵方名单，除傅、邓、董、孙[2]四人外，还有些什么人，请电傅将军，速即电告，以便在董其武通电发表后迅即发表。

二

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本日毛主席说：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参加政协。北峰兄参加政协事，毛主席认为是可以的，当与董、孙一道向筹备会提出。等情特达，请转告宜生、宝珊。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原绥远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出席政协会议的人员问题，起草的以薄一波名义致周北峰信的主要内容。本篇二是毛泽东起草的以薄一波、聂荣臻名义致周北峰信的主要内容。周北峰（1903—1986），山西永济人。北平和谈中傅作义的和谈代表。

[2] 傅、邓、董、孙，指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

祝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召开二次大会的贺电[1]

（1949年9月15日）

亲爱的维托里欧·维达里同志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大会的全体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热烈地祝贺你们的大会。庆祝你们在反对美英帝国主义者和铁托叛徒集团的勇敢斗争中所已经得到和将要得到的胜利。你们的胜利，对于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共同斗争，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和鼓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

[1] 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定于9月16日、17日、18日召开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第二次党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电表示祝贺。

祝加香八十寿辰的贺电[1]

（1949年9月15日）

亲爱的马赛·加香同志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地庆祝加香同志的八十大寿。

加香同志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的法国革命工人运动和法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活的象征。加香同志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对于法苏人民的友谊的忠诚，对于中国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热烈同情，不但是法国工人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的骄傲。

祝加香同志健康！向加香同志和以多列士同志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中央致兄弟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15日致电祝贺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道报》总编辑加香80岁寿辰。

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

（1949年9月16日）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毛主席又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毛主席的这个号召，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现在南京、天津、杭州、武汉等城市都已经或正在纷纷召开各界代表会议。

事实证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个城市解放后，在实行军事管制的时期，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要比临时参议会好得多，它可更广泛而有效地联系群众，并洗涤旧的政权机构的官僚主义的遗毒，使人民政权在群众中面貌一新。而成立临时参议会，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国民党统治时代召开过的参议会而发生不良印象；并且因为它是一个咨议机关，而在组成的成分上又往往不容易做到有广大的代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它又要比各界、各业的座谈会能更经常而

[1] 这是新华社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宽广地联系群众，因为它可经常地定期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代表沟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各界、各业的座谈会，虽然是城市刚刚解放时传布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并征询各方意见的良好方式，但它只是临时性质，缺乏固定的组织，不能解决与群众的经常的联系问题。经过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代表在会内会外的活动，可以把各阶层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使人民政府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以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更准确地规定施政方针和重要措施；同时，又可以把政府的施政情况和政策法令传达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取得群众的拥护，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行动纲领，吸引广大人民来积极地参加城市的各项建设工作。另一方面，经过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代表的讨论和工作，又可使各阶层人民由其本身利益出发的不同主张、要求和意见，得到充分的申述和沟通的机会，特别是诸如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房客和房主关系等这些涉及广大人民生活而又最易发生纠纷的重大问题，可以谋取一致的协议，使各界人民能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更亲密地团结起来，而人民政府在今后施政方面也能更全面而妥善地照顾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所以，凡是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且真正开得成功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施政效率都有很大提高，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北平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各界代表会议以后，有些人说：他过去对于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他所了解的民主是抽象的、形式逻辑的。而在参加过各界代表会议以后，才领会了民主制度的意义，领会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领会人民民主专政是何以成为必要的。

可是，直到今天，有些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对于各界代表会议的性质、意义和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军事管制时

期不宜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否则便会妨碍军管会的职权，影响社会秩序的迅速建立。他们不知道虽然是在军管时期，还是应当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因为在军事管制时期，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是由外地调来的，他们暂时还与当地群众缺乏联系，了解与反映情况难免和实际有距离，而各界代表会议网罗当地各界人民代表参加，正可成为军管会、人民政府与当地人民联系的纽带。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不但不会妨碍军管会的职权，相反地，只会增强政府的工作效能。因为实施军事管制的目的，是在于顺利地接管机关企业，建立革命秩序，发动和组织人民力量，肃清残余敌人，镇压反革命活动和恢复生产事业；而各界代表会议则正是能够团结人民，协助人民政府，促进上述目的的实现。各界代表会议的职权是由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赋予的，它是过渡时期人民参与政权建设的机关，到了条件成熟时并可赋予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以便过渡到普选的全权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只要我们领导得好，是不会与军管制度发生任何冲突的。

那么，怎样才能把各界代表会议开好呢？根据各地已有经验，至少应该注意如下三点：第一，是开会以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参加各界代表会议的人数，应当视城市大小和工作情况决定，但每个代表应该真正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在组成的成员方面，一方面应注意纯洁性和严肃性，禁止反动分子参加，否则便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各界代表会议的威信；另方面又应注意其广泛性和灵活性，应该吸收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卫戍部队、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以便市内各种不同的人民群众都能经过他们的代表与人民政府发生密切的关系。工厂、学校、机关、部队的代表，如果条件具备，应尽可能经由群众大会推选，以增强其

代表性。在会议以前，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必须准备合乎实际情况的工作报告，以便与会代表了解和讨论政府的工作。同时必须事先与代表们协商，征求群众的意见，准备一个至数个与本市广大人民生活有关而又迫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例如解决粮煤供应、精简节约、疏散城市多余人口、调处劳资争议、沟通城乡贸易、取缔投机奸商活动、恢复和发展公私经济事业、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提交会议讨论，并务期得到确实结果，作出成文决议，以便贯彻实施。

第二，会议时间不要太长，但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吸收各界代表参加会议中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使大家都能贡献力量。政府的工作报告和会中的重要提案，应该允许代表们进行充分的讨论，启发大家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能够得到反映，而政府的施政措施也能得到代表们的了解。人民政府应该虚心倾听代表的意见，了解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对于一切善意的和正确的建议都应表示接受。但成立任何决议应十分郑重，不要草率从事。在讨论中，就应引导大家研究本市实际情况，了解施政重心，分别轻重缓急，以便对于各种议案作出切实可行的不同处理办法：凡必要的而又可能办到的即应该办，凡必要的但目前还办不到的即应缓办，凡不必要而又不可能办到的则不应办。

第三，要使各界代表会议得到确实的效果，在会后贯彻会议的精神和决议，便是十分重要的事。在会议闭幕以后，应该发动代表们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群众集会场合，向各工厂、学校、团体、机关，向他们所代表的单位和群众，进行传达和报告，并发动人民群众讨论政府的工作报告和会中的重要决议，使会议的决议真正为群众所了解和接受，成为群众的行动。这就是说，要使各界代表的活动由会议中推广到群众中去，把一个代表会议化成无数的大

会、小会，使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的决议。这样，各界代表才真正尽到代表的职责，各界代表会议才能起到联系群众的作用，人民政府和各界代表会议与广大群众间的联系才会密切起来。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在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律应当召开，在新解放区的县也应一律召开全县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群众发生密切联系的机关，其重要性，和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样的。区与乡则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老解放区，凡属条件成熟的地区，则应召开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凡属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亦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过渡。总之，不论是过渡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是全权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召开。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

1949年，毛泽东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亲切交谈。左起：彭泽民、蔡廷锴、李济深、谭平山。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1949年9月16日）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1]，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

[1] 指美国的独立战争。1775年起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先后进行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1776年7月4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脱离英国。英国战败后，被迫在1783年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

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

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1]。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

---

[1]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

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

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图为在天坛祈年殿前的合影。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陈明仁在游览天坛时合影。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在天坛合影。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等游览天坛。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李明扬、陈毅同游天坛。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天坛和售货员交谈。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天坛公园。

1949年9月17日，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会议的委员在中南海勤政殿合影。

《天坛共话》（中国画）

复邓力群等电[1]

（1949年9月19日）

新疆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并获得和平解放以后，中央准备考虑成立新疆军政委员会，统辖军政财经各方面工作。除中共方面的人以外，拟请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及伊犁方面的人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机关，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兼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新疆省政府改组，包尔汉仍为主席，委员由中共方面及新疆各民族方面为主体，酌加张治中、陶峙岳方面的人。以上请你向包尔汉及迪化友人透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

（1949年9月19日）

顷接傅作义九月十七日电称，宁夏马鸿宾到包头，说八十一军军长系其子马敦静，与马鸿逵部系属两事。无论如何方式，只要解放军不打，能使八十一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请先停止作战，以便商谈。中央军委请彭、张即考虑处置办法电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复傅作义电[1]

（1949年9月19日）

毛主席说：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与马鸿逵部分别看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无论马鸿宾或马敦静如欲解决问题，应速派代表至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找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或到固原十九兵团司令部找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如马鸿宾能亲去兰州或固原一趟，则更好。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是和马鸿逵有区别的，他正想找马鸿宾接洽。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请傅宜生速为转知，以免误事。又西北前线对宁夏进军的时间已很迫近，宁夏代表应速去固原或兰州，不要再迁延了。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以薄一波名义复傅作义电的主要内容。

复邓力群等电[1]

（1949年9月20日）

蒋介石对新疆必然还要勾引，陶峙岳及其部下还可能观望一下，目前不要强陶立即派代表去兰州，因我军未入新疆，陶派代表去也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我们已通知陶派代表，至于是否派及何时派则由陶自己决定，不要催他，事实上新疆局面以暂维现状等待我军入新时解决为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用打拉两种办法迅速解决宁夏问题[1]

（1949年9月20日）

彭、张、阎、甘：

十九日电悉。你们处置甚对，傅作义明日可返平，当与面谈拒马[2]入绥[3]。你们则靠自己力量，用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

军委

哿酉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参谋长阎揆要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电报。

[2]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3]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毛主席、朱总司令回答董其武等起义通电[1]

（1949年9月20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日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本日回答绥远董其武将军等九月十九日的起义通电如下：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1] 1949年9月19日原国民党绥远当局董其武将军发表起义通电。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毛主席朱总司令回答董其武等起义通电》的手稿。

聂荣臻将军、薄一波政委电贺绥远和平解放[1]

（1949年9月20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日电】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于本日电贺绥远和平解放。该电称：

董其武将军及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和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九月十九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派[2]残余集团，完全消减之期在□，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

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弄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

---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9月20日给绥远起义的董其武的贺电，交由新华社发表。原题为《致董其武将军等贺电》。

[2] 此处为两个“反动派”，毛泽东圈掉了一个“反动派”。

全中国而奋斗。

聂荣臻

薄一波

九月二十日

请乔木今晚发表，明日见报。[1]

毛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此文给胡乔木的批示。

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电讯稿《聂荣臻将军、薄一波政委电贺绥远和平解放》的手稿。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人员问题给各中央局的指示[1]

(1949年9月21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省委，**各野战军前委，平津两市委：**[2]

（一）在我新接收的城市中，对旧人员的处理应十分慎重。这些人员，除少数战犯、特务，及劣迹昭著的分子以外，一般均将其希望寄托于我们，其基本要求是吃饭。京、沪、杭解放后，把旧人员裁了二万七千余人，引起很大波动。北平和平解决后，遣散傅部军官一万七千人，均逃到绥远，怨天恨地，现在仍须由我负担解决。所有这些经验说明，旧人员一般地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须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

（二）党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养活这些人的责任，我们准备在全国解放后在一定期间内，包括新旧军政人员在内总共在工作中养活九百万到一千万人，这在财政上必然会有很大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而在政治上有十分必要。

（三）对已解放城市，如京、沪、汉、长沙、兰州等，及将解放城市，如广州、重庆、迪化、台湾等，接收之国民党旧工作人员，

---

[1] 这是毛泽东等修改的给各中央局的电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此处黑体字为周恩来修改时所加的文字。

除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的分子等而为群众所十分不满者，应予撤职并依法办理外，一般均应予以留用。但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四）一切人民政府机关、财经机关，**特别是**企业机构，均须改变国民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作风，**闲杂人员及庞大的机关应加以精简。但对**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而应**举办大的训练班，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薪水低的可少打折扣）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学习成绩须认真加以考核，量材录用，学习好的优先录用。[1]

以上各点，望即遵照执行。

中央

申马

[1] 此段黑体字为刘少奇修改时所加的文字。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

（1949年9月21日）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

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

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时的中南海新华门。

1949年9月21日下午，毛泽东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时签名。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时签名。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时签名。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代表的签名册第一页。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在大会主席台上。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开幕式时，执行主席在主席台上。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

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1949年9月，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1949年9月，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1949年9月，无党派人士代表李济深、何香凝在填写选票。

1949年9月，无党派人士代表郭沫若、马寅初在填写选票。

1949年9月，朱德、周恩来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投票。

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投票。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和民主人士何香凝女士交谈。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交谈。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合影。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新疆代表团向毛泽东赠献民族服装。

1949年9月，贵州苗族群众代表向毛泽东赠送苗族的服装。

1949年9月，朝鲜族群众代表向毛泽送献礼。

《新征程　新任务》（中国画）

人民日報

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第二日
聽取籌備會四項重要報告
批准籌備會關於籌備工作的報告
對共同綱領等草案的意見將由三個委員會分別整理

人民政協主席團會議決議
毛主席等任常委

籌備會代理秘書長
林伯渠報告籌備經過

斯大林電賀加香八十壽辰

譚平山
人民政協

人民日報

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慶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

全國人民團結一致！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團結國際友人！

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
毛主席開幕詞

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部分报道。

给张治中[1]的信

（1949年9月21日）

文伯〈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付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2]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3]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4]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鲍[5]见了面，谈得还

---

[1]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从1946年3月起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9年春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参加国共和谈。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他被挽留在北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 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人。当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率部起义。

[3] 邓力群，1915年生，湖南桂东人。当时是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联络员。

[4] 邓飞黄（1895—1953），湖南桂东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河南、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8月在湖南参加起义，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5] 陶，指陶峙岳。鲍，指鲍尔汉（1894—198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人；1946年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副主席，1949年参加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是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好。关于周黄两军[1]，自向甘凉肃[2]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3]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九月廿一日

[1] 指周嘉彬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一二〇军和黄祖熏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一军。

[2] 指当时甘肃省的甘州、凉州和肃州，即今张掖、武威和酒泉。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毛泽东致张治中信的手稿。

给沈雁冰[1]的信

（1949年9月23日）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2]，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3]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

[1] 沈雁冰，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

[2] 指毛泽东1949年9月23日给《人民文学》创刊号写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3] 沫若，即郭沫若。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

（1949年9月23日）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号的题词。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9月23日）

宁夏与绥远无关，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马鸿逵、马鸿宾二部处理办法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复鲍尔汉电[1]

（1949年9月23日）

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鲍尔汉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的来电后的复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国都和纪年问题时的发言

(1949年9月25日)

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之斧头镰刀。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

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国都问题，还是改一个字好（按：指北平改为北京）。

纪年问题，老百姓要用（民国纪年）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法去处罚他们。如过去用中华民国多少年，但老百姓要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我们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就是耶稣也并不坏，耶稣和今天所推行之基督教、之帝国主义并不一样。

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紧密合作

（1949年9月26日）

彭德怀[1]同志，并告西北局：

二十五日电悉。（一）陶峙岳[2]派曾震五[3]来兰[4]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二）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日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十一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四百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三十架至五十架运输机。（三）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

---

[1] 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陶峙岳，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在新疆率部通电起义。

[3] 曾震五，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司令。

[4] 兰，指甘肃兰州。

八万人，号称十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1]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十一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2]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为主任，习仲勋[3]、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四）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鲍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鲍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鲍尔汉省政府是汉人十名，维族等十五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鲍尔汉及迪化[4]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五）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三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方为主席，甘省府以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山为主席。（六）入川军事，待邓小平[5]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泽东

九月二十六日

---

[1] 刘孟纯，原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1949年9月26日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一起通电起义。

[2] 贺，指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

[3] 习仲勋，当时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4] 迪化，旧市名，即今新疆乌鲁木齐。

[5] 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关于组织部分政协代表发言给周恩来的信

（1949年9月26日）

周：

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即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毛泽东

九月廿六日三时

中共中央关于庆祝新政协召开和人民政府成立的指示[1]

（1949年9月27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兵团：

（一）中国人民政协的召开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各地应举行盛大热烈的庆祝。此项庆祝，除首都北平外，全国各地应结合国际和平斗争日的群众行动，于十月二日同时举行之。

（二）北平于十月一日举行庆祝人民政协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并举行阅兵典礼。十月二日与三日举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分会。各地、各团体应向这一大会发出贺电。北平于十月七日举行群众大会，庆祝世界和平中国分会与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

（三）其他各大城市（中小城市亦尽可能举行）和各兵团（军队以不妨碍战斗为原则）、各团体、各学校于十月二日均应尽可能组织广大群众的集会与游行，报纸出特刊，组织各界代表人物的谈话和广播，运用各种群众文艺形式，造成全国人民的狂欢，并普遍进行关于毛主席所指示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与团结国际友人这一总方针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的教育。

（四）庆祝口号另发。

中央

申感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上。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陶峙岳鲍尔汉[1]

（1949年9月28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八日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本日复电回答新疆军政当局陶峙岳将军、鲍尔汉主席等廿五日及廿六日的通电。该电称：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鲍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

[1] 1949年9月25日、26日原国民党新疆当局陶峙岳将军、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分别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8项和平条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处置。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陶峙岳、鲍尔汉》的手稿。

叶剑英将军奉命南下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

(1949年9月28日)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叶剑英将军奉命南下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的手稿。

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

（1949年9月29日）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毛泽东

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的题词。

为《新华月报》题写报头

（1949年9月29日）

新华月报

毛泽东为《新华月报》题写的报头。

为《新建设》杂志创刊题词

（1949年9月29日）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九日

毛泽东为《新建设》杂志创刊的题词。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

（1949年9月30日）

全国同胞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

[1] 这是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1]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

[1] 此句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

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认真写选票。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场起立，鼓掌祝贺。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1949年9月30日，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在政协会议主席台上。左起：刘少奇、朱德、毛泽东、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东方红》（油画）

《东方红》（油画）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

（1949年9月30日）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2]，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

[2] 一千八百四十年，指英国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年份。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上。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为《新华日报》第一次题写报头[1]

（1949年9月）

新华日报

毛泽东为《新华日报》第一次题写的报头。

[1]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久，在北京中南海举行的欢送南下干部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决定。随后，毛泽东第一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该报头于1949年9月17日正式启用。

为《黑龙江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9月）

黑龙江日报

[1] 《黑龙江日报》创刊于1945年12月1日，是原哈尔滨特别市的《哈尔滨日报》和北安的《黑龙江日报》、松江省的《松江日报》、合江省的《合江日报》、嫩江省的《新嫩江日报》等报合并成的。1949年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亲笔挥毫，为《黑龙江日报》题写了报头。

毛泽东为《黑龙江日报》题写的报头。

为《新建设》题名[1]

（1949年9月）

新建设

毛泽东为《新建设》题写的刊名。

[1] 《新建设》杂志是1949年9月创刊的，它的前身是《中国建设》半月刊，简称《中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吴晗请毛泽东为《新建设》题写刊名，毛泽东写了3张，由张志让指导史济舟从中选出字体大小均匀的3个字，一直沿用到“文革”停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949年10月1日）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

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部分）合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賣國投敵以來，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反革命戰爭以來，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之中，幸賴我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擁護之下，為保衛祖國的領土主權，為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爭取人民的權利，舊不顧身，共為作戰，得以消滅反動軍隊，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現在人民解放戰爭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全國大多數人民業已獲得解放。在此堅硬之上，由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閉會，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賀龍、李立三、林伯渠、葉劍英、何香凝、傅作義、程潛、張治中、張鼎丞、張東蓀、張奚若、張瑞芳、張澤民、張治中、張雲逸

公函

逕啓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已在本日發表了公告。我現在將這個公告覆函送達閣下，希爲轉交貴國政府。我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是需要的。此致

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於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用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致各国政府的公函。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

茲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通過任命羅榮桓為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
檢察長
特此通知

主席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毛泽东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持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雄壮的国歌在奏响，礼炮在轰鸣，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张澜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等在开国大典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伯承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开国大典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了阅兵式，有近2万名官兵参加了检阅，他们代表着40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方队接受检阅。

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行进。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装甲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1949年10月1日，空军的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接受检阅的飞机致意。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毛泽东巨像。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这个难忘的日子。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夜，整个首都一片欢腾。

人民日報

首都三十萬人齊集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典禮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

毛澤東主席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

朱總司令檢閱海陸空軍宣讀人民解放軍總部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首次會議

正副主席及委員宣佈就職

電毛主席慶賀新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澤東

中國人民解

外交

將

社論

不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报道。

《开国大典》（油画一）

《开国大典》（油画二）

《开国大典》（油画三）

《开国大典》（油画四）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油画）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画）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画）

《一唱雄鸡天下白　换了人间》（中国画）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版画）

给侨胞的题词[1]

（1949年10月1日）

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

毛泽东

1949年，毛泽东和华侨代表陈嘉庚、庄明理合影。

[1] 华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祖国的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之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为侨胞们写下了这个题词。

毛泽东为侨胞的题词。

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1]

（1949年10月3日）

【新华社北京三日电】在本月一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以公函向各国政府发出毛泽东主席的公告后，苏联政府业已收到此项公告，并于二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以葛罗米柯署名的照会电达周恩来部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葛罗米柯的照会如下：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受苏联政府之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安德烈·葛罗米柯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钟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发表于1949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

对程潜陈明仁所提要求和建议的处置意见

（1949年10月5日）

林彪[1]同志，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

（一）程潜、陈明仁[2]按其现在的表现看来，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在我和他们谈话时，李明灏[3]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4]及他处时，让其参加作战立功。（二）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六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三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程潜，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陈明仁，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1949年8月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3] 李明灏，原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员，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在华北军政大学任职，曾参加过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并对促成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做出了贡献。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4]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惟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干部应有安置，即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六师。我认为陈明仁这点意见是合理的。十月十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二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程潜在京多留若干天，然后返湘。（三）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大意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四）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五）陈明仁几次提出想去前线打仗立功，我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在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很好的。此点亦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六）程潜、李明灏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十五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叫他们回去时

和你们谈一下。此点亦请你们加以注意。（七）以上各点，你们意见如何盼复。（八）程、陈、李等对此次政协会议[1]观感甚好，表示有信心干下去。我告诉他们，补人补枪等事，要待人枪到了手才算数，不要向下面宣布，免引起失望。要他们将现有三万多人整训好，不存奢望，并对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和不满意之事，作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方面则尽可能设法帮助他们，尽可能使他们满意些，减少他们的困难。双方这样做法就可能将事情办好。

毛泽东

酉微

[1] 政协会议，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关于安排程潜、陈明仁、李明灏看望王耀武、杜聿明、黄维等的电报[1]

（1949年10月5日）

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

国民党散布谣言，说王耀武、杜聿明、黄维[2]等均被我们杀了。为揭破此点，程潜、陈明仁、李明灏[3]三人由京返湘路过济南时将留济南一二天看一看王、杜、黄等人，并可能到泰山、曲阜游览一下，请作准备，并妥予招待（陈、李约十月十日左右离京，程潜稍后离京）。如王、杜、黄等在青州，请先期调至济南。如何盼复。

中央

十月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电报。

[2] 王耀武，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在济南战役中被俘。杜聿明，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黄维，原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3] 程潜，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陈明仁，原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湖南军区副司令员。李明灏，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员，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在马叙伦[1]请假信上的批语

（1949年10月5日）

请林老[2]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

毛泽东

十月五日

[1] 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2] 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给黄炎培[1]的信

（1949年10月5日）

任之先生：

三日惠示敬悉。盛意可感！在共同纲领发布之后，我似不宜迅即重复说一遍共同纲领里说过的话，如像经济问题等事。因此，除公告外，暂时不拟发表个人文件，这样似较适宜。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十月五日

[1] 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答谢福斯特、但尼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1949年10月6日）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但尼斯同志，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请将我的谢意转达给美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转达给全美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对中国人民怀有善意的人们。

诚如你们所说，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在这个斗争中，美国的共产党人和一切真诚的民主分子是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

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尽管美国反动政府野蛮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非法地审讯美国共产党的十一位领袖，即但尼斯同志，威廉姆森同志，温斯顿同志，斯塔彻同志，戴维斯同志，温特同志，汤姆森同志，盖兹同志，波达许同志，格林同志和贺尔同志，但是事实毕竟表明了，正确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胜利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中国友人，而违反正义并因此可耻地失败了的则是美国现

在的帝国主义政府。这个事实，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

同意第四野战军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1]

（1949年10月7日）

林、邓、谭、萧、赵：

（一）同意五日十二时电[2]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

（二）白崇禧[3]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军委

七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指1949年10月5日12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今后向广西进军仍以5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机会而不能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中央关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广州军管会等机构的电报

（1949年10月7日）

叶、方[1]，并告华中局：

酉冬电悉。（一）广州军管会及广州警备机关名单除照你们所拟外，应加李章达张醁村吴奇伟[2]三个党外人士为军管会委员。（二）广州军管会及广东省政府均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三）你们拟定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

中央

酉虞

---

[1]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2] 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张醁村，无党派民主人士。吴奇伟，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5月率部在广东东部、福建西部起义；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转发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的批语

（1949年10月7日）

华中局，华南分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

浙江省委这一报告[1]很值得注意，务请你们加以研究，避免重犯错误。这一报告的写法也是很新鲜的。

毛泽东

十月七日

---

[1] 指1949年9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给华东局并报中央的关于浙江省委5至8月份工作的综合报告。这个报告谈了军事、城市、农村、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会师4个方面的工作，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军事工作。对俘虏处理得很粗糙，除一部分精干者补入部队外，大批的就地遣散，造成了成群结队沿途抢劫，危害人民很大，许多无法回家者则散落乡间为散匪等。这是浙江匪特来源之一。如果我各野战军不为当时困难所屈，对俘虏不急即遣散，仍经过审训过程有组织遣散，此害可免。同时我入浙各军，由于被连续作战所牵制，未能及时展开清剿，以致给保安团队、县区自卫队及某些未被全歼的残敌以喘息整顿的时机。7月，大军南去，残敌遂向我攻击，造成一时被动。此外，将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工作也做得不及时。浙江迟到8月份才开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使工作遭到了不少损失。在新区，依靠一支主力部队来整顿地方武装，清剿散匪，巩固政

权，是不可少的步骤。二、关于城市工作。进入城市第一件事就是金融和物价，省委及各市委、市政府除用一部分力量去处理伪币、银元之外，应把主要力量放在整理税收、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上去，这才能逐步解决金融和物价问题。浙江的税收和城乡关系，直到8月份才走向正轨。职工工作，花的力量最大，但成绩不多，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缺乏做过工人工作的干部，加上开始不敢大胆放手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事前也未将干部集中训练一下，弄成了乱撞乱找，茫无头绪。经过7月份办工人训练班，才逐步使这一问题走向正轨。对资本家的合作，抓得不紧，做得不够，资方对我怀疑尚未完全去掉。在劳资问题上，不懂得应先与工人群众商量，主要在内部进行工作，当资本家破坏时，就应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关于贸易公司、铁路、邮政、电话局、银行等企事业单位进入市场闹独立性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他们强调其直接系统，妨害了整个工作的进行。最好在一切工作未上轨道前，不要什么直接系统，一律通过当地党的领导。关于恢复生产问题，开始是盲目地叫着恢复和发展生产，由于遇上淡月大部分生产停顿，加上粮荒严重，粮价突出采购价之上，曾使生产陷于困境。加上整个工作未围绕生产这个中心，因此直到8月份，生产才开始好转。关于治安工作，杭州市反匪特斗争有成绩，主要经验是，大胆用敌方人，在生活上照顾，在政治上抓紧，使匪特活动得以事前破获；及时解决公安武装问题；大胆使用能吸收新事物、愿意埋头苦干、肯用脑子的干部去工作；整个保卫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关于接收工作，一般旧职员均能遵守初期原封不动听候接收的原则，因此接收工作可以有步骤地进行，但必须发给维持生活的用费。7月份后，因为财政困难草率遣散了一部分旧职员，影响不好。三、关于农村工作。浙江农村群众是在大革命风暴中，正如干柴遇烈火之势，对我希望很高。初期，因我农村干部少，部队也怕讲错了话，只是宣传约法8章，加上当时对匪特未及时镇压，群众中发生了若干怀疑。从7月下半月开始，大批工作队下乡，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农村情况大变了。8月份开始在400多个乡发动群众，农民已普遍有反霸、减租减息的要求，老游击区则要求土改。农村工作所遇到的问题有，南下干部不敢大胆放手让群众行动，害怕犯错误；不相信当地干部及青年学生，以为文化高的人就不纯洁等。这些问题，在7月份召开的各地委会议上才大体解决。四、关于会师工

作。大体上已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目前关键问题在于游击区的党及干部，大多是渡江前后发展的，党内不纯比较严重；而南下干部中，主要倾向是过分夸大了这一面，存在对当地干部不信任及某些狭隘观点。因此，在双方团结上还存在一定的隔阂，县以上领导机关中尚比较好，中下级干部中问题还比较严重，亟待克服。

关于杨开智等工作安排问题的电报

（1949年10月9日）

一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九日

二

长沙上营盘街三十号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给谭政、陶铸[1]的信

（1949年10月9日）

谭、陶：

六日电悉。毛泽连、李祝华二人可许其来京一看，但请你们对他们二人讲明是许其来京看一看，随即回到湖南乡下去。

毛泽东

九日

[1] 谭政（1906—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同意聚歼白崇禧主力的作战计划[1]

（1949年10月10日）

林、邓、谭、萧、赵，并告叶、陈[2]：

十日七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3]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4]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军委

十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曾生，当时任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林平，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毛泽东、朱德致“长治”号舰[1]全体起义人员电

（1949年10月10日）

长治号全体起义的同志们：

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行动。由于国民党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

[1] “长治”号舰是原国民党政府军海防第一舰队旗舰，1949年9月19日在上海吴淞口外起义。

对新疆赵锡光、鲍尔汉、马良骏等祝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复电

（1949年10月10日、21日）

一

赵锡光将军：

一日电悉。新疆和平解放，全国欣慰。望南疆驻军全体官兵，团结一致，为改造自己成为人民军队而努力。

毛泽东

十月十日

二

鲍尔汉主席，并转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全体委员：

感谢你们的祝贺。望与人民解放军及全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推行共同纲领，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三

马良骏先生，并转全疆回胞均鉴：

感谢你们的祝贺。希望你们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十八兵团由贺龙统率入川[1]

（1949年10月11日）

宗逊，并告德怀[2]及西北局：

酉佳电悉。（一）昨日中央会议已决定十八兵团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3]同志统率入川。（二）向胡宗南[4]作战的兵力，除十八兵团外，尚须令刘金轩[5]部及七军予以配合。在占汉中一带后，刘金轩部除守卫汉中为中心一带地方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十八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七军须准备进占陇南文、武、成、康[6]一带。（三）向汉中一带进攻的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请令有关各部于十一月下旬准备完毕。

军委

酉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贺龙，原任西北军区司令员。此时已被任命为将要组建的西南军区司令员。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5] 刘金轩，当时任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十九军军长。

[6] 文、武、成、康，指甘肃文县、武都、成县和康县。

十五兵团暂不进攻广州[1]

（1949年10月11日）

林、邓、谭、萧、赵，并告叶、陈[2]：

十一日十时电[3]悉。（一）关于调陈赓兵团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接入桂一点，已于今晨答复你们同意这样做，请径令陈兵团执行。（二）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入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十五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10月11日10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使广东之敌不退回广西，则我应暂不继续进攻广东，而以广东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作为吸引广东敌人的工具。同时，能使我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广西之敌作战，首先达到歼灭广西之敌，然后在军政配合下，以四野部队解决广东之敌。因此，我们建议陈赓邓华两兵团皆不要继续南进，而以邓华之两个军监视广东敌人，并集中兵力经常歼敌之分散部队。陈赓部则西进，参加广西作战。只要广西敌被歼，很多敌人皆可争取和平解决。故歼灭广西之敌，已成为全战局的中心环节。

五兵团与曾生林平[1]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三）关于十五兵团是否可以早日去占领德庆、高要一点，请叶方[2]与邓赖[3]商酌电告。（四）曾生林平等部似宜进至新丰、龙门、佛冈一带，不要去惠州以南。

军委

十一日二十四时

---

[1]　曾生，当时任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林平，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叶，指叶剑英。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3]　邓赖，指邓华、赖传珠，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关于同意约鲍尔汉[1]至酒泉商谈的电报

（1949年10月11日）

德怀[2]同志：

十日九时电悉，同意你约鲍尔汉至酒泉商谈。

毛泽东

十一日二时

---

[1] 鲍尔汉，当时任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10月11日）

山西日报

毛泽东第一次为《山西日报》题写的报头。

[1]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攻打太原时，创办《山西日报》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着——中共中央华北局责成华北局宣传部和华北人民日报社紧急组建山西日报社工作班子。部队从河北平山向太原进发前，从华北人民日报社、冀中导报社等单位调来的干部请当时在平山的毛泽东题写报头，毛泽东挥笔写下了圆润遒劲的“山西日报”4个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

慎重考虑围歼白崇禧部计划 力求做到确有把握

（1949年10月12日）

林彪[1]同志：

因为据你们十日七时电[2]，白崇禧[3]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4]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十一日十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5]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

---

[1] 林彪，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指1949年10月10日7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由衡阳、宝庆线南退之敌军4个师已被我军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其余敌军亦正回头北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灭白崇禧部主力之可能。建议陈赓兵团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歼灭白部。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陈赓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5] 零陵，旧县名，1984年并入湖南永州市。

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1]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三时

[1] 宝庆，即湖南邵阳。

相机占领广州和围歼白崇禧部

（1949年10月12日）

林彪[1]同志，并告叶、陈、方、邓、赖[2]及刘、邓、张、李[3]：

（一）你们十一日二十一时电[4]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5]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

---

[1] 林彪，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邓，指邓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赖，指赖传珠，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

[3] 刘、邓、张、李，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4] 指1949年10月11日21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在广东敌人不与我作正面战斗的情况下，我们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以免促成粤桂敌人之集中。目前只以邓华兵团留广东打运动战，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赓邓华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在对粤敌企图未判明前和我军能否抓住敌人未证实以前，陈赓邓华两兵团目前仍继续照原计划向广州前进。

[5] 陈邓两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陈赓和邓华。

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二）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1]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2]、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三）二野五兵团请令其迅向贵州前进，并令十八军先出贵阳。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六时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零陵，旧县名，1984年并入湖南永州市。

毛泽东致前线将领电的手稿。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取得衡（阳）宝（庆）战役的胜利，歼灭白崇禧等部3万余人。

1949年10月14日，人民军队占领广东。

1949年，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进军。

关于草拟华东军政委员会名单给陈毅[1]的信

（1949年10月12日）

陈毅同志：

请邀集刘晓粟裕[2]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

[2] 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1]

（1949年10月12日）

彭、甘，并西北局：

九日酉时电悉。（一）伊宁民族军[2]必须有一人为新省[3]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4]至迪化[5]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三）民族军应有一部开迪化，另一部开乌苏。此事待与赛福鼎[6]商量后，再告。（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邓力群为委员。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7]，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电报。

[2] 伊宁民族军，指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3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军。这支民族军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建立了以伊犁的伊宁县为中心的解放区，至1949年9月发展到1.4万余人。

[3] 新省，即新疆省，1955年撤销，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指彭德怀。

[5] 迪化，旧市名，即今乌鲁木齐。

[6] 赛福鼎，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

[7] 民主同盟，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

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中央

十月十二日

转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

（1949年10月13日）

一

德怀、仲勋[1]，林彪、子恢[2]，剑英、方方[3]，小平、伯承、贺龙[4]，一波、澜涛[5]，高岗、富春、林枫[6]，康生[7]：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

[3]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4]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1949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这时尚未到职。

[5]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

[6]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

[7]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据饶漱石[1]同志十月十一日电称，“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九月三十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成立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对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均甚大。证明，在各县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会议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计：（一）我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工商业政策问题。（已在十月六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道。（三）县委书记关于松江工作与任务的报告摘要。（四）介绍松江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拟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如仍需由内部专门总结报告，请电示办理”等语。上述文件俟收到后即由新华总社广播，你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二

漱石同志：

酉真电悉。（一）松江会议成功，极为欣慰。俟各项文件收到后，即由新华总社广播各地。我已将你的来电转发各中央局负责同志，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华东局所属则请你通令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全国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请你抓住松江经验，要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二）内部总结报告，不需要了。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

（1949年10月13日）

德怀[1]同志：

（一）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二）刘金轩[2]部及七军配合作战。战后七军位于陇南工作。刘金轩部除守卫陕南外，是否抽一部入川，那时再酌定。（三）歼胡[3]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4]、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四）二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十二月可到川南。二野陈赓兵团[5]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6]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四野主力歼白[7]，大约明年一二月可入云南。（五）担负西北任务的三个兵团，以两个兵团（即第一第二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刘金轩，当时任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十九军军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4] 叙，指叙州，即四川宜宾。泸，指四川泸州。

[5] 陈赓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6] 邓华兵团，指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邓华。

[7] 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一个兵团（即十九兵团）待宁夏工作结束后，不担任地方工作，开至天水、宝鸡、潼关之线专门整训，作为国防机动兵力，以备不虞（此点在数月前已电告）。请准备适当兵力，于数月后，接任宁夏地方工作。（六）经营云、贵、川、康[1]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2]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

[1] 康，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 邓刘贺，指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手稿。

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1]

（1949年10月13日）

林、邓，叶、陈：

据香港十月十日电称，“（一）据空军高级人员方面获息，蒋[2]电李白[3]，弃守广州，坚持广西；并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二）据熟悉桂系的人说，桂残军如退入桂境，当会大部逃散，丧失战斗力。现白匪正大量廉价售卖枪支给地主，拟大量组织地方反动势力，并在桂东演习坚壁清野，连谷种都要毁灭”等语。请加注意，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

军委

十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李白，指李宗仁、白崇禧，当时分别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和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在表扬歼灭白崇禧[1]主力的部队的电报[2]上的批语

（1949年10月13日）

程颂云[3]先生阅。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被歼灭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十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

---

[1] 白崇禧，1949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指林彪、邓子恢、谭政等1949年10月12日表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四十一军和四十九军歼灭白崇禧主力的电报。

[3] 程颂云，即程潜，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

给冯友兰[1]的信

（1949年10月13日）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

敬颂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1] 冯友兰，当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毛泽东致冯友兰信的手稿。

给上海市纸业革新促进会的题词

（1949年10月13日）

你们提倡由纸的商业转变为造纸工业，改良土纸及推广土纸使用范围，都是好的。你们用土纸抄写我的几篇文章，我是感谢你们的。现在我给你们写了几句话，但请你们不要用为广告。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为《南方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10月13日）

南方日报

毛泽东为《南方日报》题写的报头。

[1] 1949年10月12日，正在北京的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即将诞生的《南方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欣然应允，第二天一早即把写好的报头字横竖数款交给张云逸，并在张云逸给叶子龙的信上批示“照写如另纸。送张云逸同志。毛泽东十月十三日早”。

张云逸请毛泽东题写报头的信及毛泽东的亲笔批示。

为了解罗章龙的情况致湖南省委电

（1949年10月14日）

湖南省委：

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即罗章龙来信，申述他自被开除党籍后十七年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绩，说他并无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请派人至湖南大学调查是否属实电告。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中央关于发表广州军管会和市政府就职布告的电报

（1949年10月15日）

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

我军即入广州。你们可以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照前定名单（增加李章达张醁村吴奇伟[1]三人）立即发表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就职布告，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叶剑英[2]为市长，李章达及我方一人为副市长，朱光[3]为秘书长）的就职布告。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时再行追认。

中央

酉删

---

[1] 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张醁村，无党派民主人士。吴奇伟，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5月率部在广东东部、福建西部起义；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3] 朱光，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

中央关于新疆三区[1]代表和彭德怀[2]会谈问题的电报

（1949年10月15日）

力群[3]，并告彭：

十三日电悉。自治区[4]军政代表至彭处谈话，第一步是询问情况，在彭对情况未明了前难于提出初步方案。此次出席政协的赛福鼎阿里木江[5]二人，不久可由京乘飞机赴酒泉与彭见面，一切问题均可和赛阿二人商谈。故自治区暂时可以不另派代表去酒泉，待赛阿与彭谈话并回至伊犁后，如有必要再派代表为宜。

中央

十月十五日

---

[1] 指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于1944年11月举行的武装起义后形成的三区人民自治区域。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力群，即邓力群，当时是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联络员。

[4] 指新疆三区。

[5] 赛福鼎，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阿里木江，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

同意分步骤在新疆进行军事工作[1]

（1949年10月15日）

彭、甘、许、王、徐[2]：

酉文戌电[3]悉。我们认为你们分两个步骤在新疆进行军事工作及设置军事机关的意见是正确的，望照此妥慎办理。

军委

酉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甘，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许，指许光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王，指王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徐，指徐立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0月26日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

[3] 指彭德怀等1949年10月12日关于分两步进行改编陶峙岳部的工作给军委的电报。

为《中苏友好》杂志创刊号题词

（1949年10月15日）

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苏友好》杂志创刊号的题词。

给张仲实[1]的信

（1949年10月15日）

张同志：

杂志[2]名称，请郭沫若[3]先生写为好。另写了一句话[4]作为杂志创刊号的题词。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

[1] 张仲实，当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

[2] 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出版的《中苏友好》杂志。

[3] 郭沫若，当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

[4] 指毛泽东题写的“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

致卫立煌[1]电

（1949年10月15日）

张枫[2]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3]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酉删

---

[1] 卫立煌，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沈阳解放前夕回到南京，被蒋介石软禁。1949年初出走香港。他给毛泽东的电报是从香港发出的。

[2] 张枫，即饶彰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

[3] 指卫立煌1949年10月3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全文是：“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给周世钊[1]的信

（1949年10月15日）

敦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答复。谨此奉复。

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

---

[1]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49年10月16日）

罗申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贵大使的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热烈地欢迎贵大使出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在此，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递交的国书。

1949年10月16日，罗申向毛泽东呈递国书。

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罗申大使向他递交国书后讲话。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1949年10月16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威廉·皮克总统和奥托·格罗提渥总理：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全中国的人民，热烈地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热烈地祝贺威廉·皮克先生和奥托·格罗提渥先生当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表示德国历史的根本转变。人民大众代替独占资本家和大地主成为德国的主人。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曾经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心的德国，现在已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加入了人民民主国家的行列。这是以美国反动政府为首的帝国主义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分裂德国并恢复德国成为反动国家和战争基地的罪恶政策之决定性的失败，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利。

人民的德国和人民的中国同处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最前线，当此民主德国宣告成立之际，我们特别感觉高兴。谨祝德国在人民民主力量领导之下恢复统一和日益强大，谨祝中德两国人民友谊日益发展。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于北京

四兵团应乘胜追击占领高要德庆等县

（1949年10月17日）

林彪[1]同志，并告剑英、陈赓[2]：

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

---

[1] 林彪，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

（1949年10月19日）

林彪[1]同志，并告叶、陈[2]：

十八日十二时电[3]悉。（一）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二）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4]、泸州、重庆一带，贺[5]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

---

[1]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华中军区司令员。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林彪等1949年10月18日12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关于广西作战，我们准备以围剿与长追的办法，争取歼敌于果德、南宁以东地区。目前，桂林、全州以东、以北，敌我相距较远，我正面部队估计已甚难抓住和抑留敌人。因此，拟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二、如估计两广之敌、通四川之敌皆可能向云南退却，则我二野部队是否可以五兵团先占昆明，以三兵团占贵阳，夺取敌之后方，分割与隔断敌人，然后二野由昆明再向北解决四川问题为好。

[4] 叙府，今四川宜宾。

[5] 贺，指贺龙，1949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仍在西北，尚未到职。

（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一百五十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一百五十万人，是指我军六十万人（其中二野全军五十万人，贺部十万人），张群[1]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2]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九十万人，主要是在四川。（三）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3]等部，共有敌军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四）请根据上述方针进行部署。（五）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毛泽东

酉皓

---

[1] 张群（1889—1990），四川华阳（今属双流）人。1949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3] 卢汉（1895—1974），云南昭通人。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率部在昆明起义。

关于高凌云[1]师与陕北伊盟部队合编的电报

（1949年10月19日）

彭、习[2]：

我认为习、张[3]酉灰电第二方案较好。高凌云仍当第二师师长。该师开回陕北与陕北伊盟部合编，加强战力，作为陕北伊盟警备部队，如此对外影响较好。左协中[4]在政协会后有进步，应在陕西给以适当位置（例如省府委员）。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酉皓

---

[1] 高凌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3] 习，指习仲勋。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4] 左协中，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8年5月率部在陕西榆林地区起义。

中央关于物色民主分子参加广西工作的电报

（1949年10月19日）

华中局：

你们十七日吸收李任仁[1]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云逸[2]正和李任仁谈此事。我军占领广西全省后还要物色其他民主分子参加工作。

中央

酉皓

---

[1] 李任仁，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1947年冬在香港参加发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 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

给斯大林的信

（1949年10月20日）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日于北京

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49年10月20日）

一

现在作战情况是这样：

第一野战军四个兵团（原来西北两个兵团，华北去了两个兵团），四十余万人，由彭德怀[2]率领。

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五十万人，由刘伯承、邓小平[3]率领，现正运动中，准备到西南去。现已到宝庆地区，正补棉衣，棉衣穿上后即去。

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六十万人，由陈毅、饶漱石、粟裕率领，主要是对付帝国主义。现一部正在金门、定海[4]地区作战，一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4] 定海，今浙江舟山。

部正准备船只，准备攻台湾。这个野战军我们准备完全不动。

第四野战军由林彪[1]率领。这个部队比较大，北平南下时有八十万人，现在又加上程潜、陈明仁[2]的，李先念[3]的，华南的，已超过一百万人。这个部队现在所占的地区，大都是新区，只有河南、湖北才解放两年，算半老区，其他全都是刚解放不久的。这个部队对外国关系不大，只有广州一地，帝国主义要来的话只有英国，我们在广州驻有两个军，并有广东广大的地方军配合。

现在我们对付帝国主义有两个中心：一是上海，一是天津。青岛关系还不太大。现我们已在北宁线[4]集结了十五个师，上海地区全部靠三野。

进军西南的由刘邓三个兵团及贺龙[5]一个兵团，共六十万人，任务是经营云、贵、川、康[6]。贺龙部直下川北、川康边，刘邓部则从大别山到峨嵋山。估计今冬除昆明外，西南可全部解放。昆明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程潜，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与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陈明仁，原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与程潜在长沙率部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3] 李先念，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北宁线，指北京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5]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此时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尚未到职。

[6] 康，指西康，旧省名，1955年撤销。

因陈赓[1]部需大迂回，时间较长。

西北的新疆问题。一野先头师十月十五日已到哈密，正与陶峙岳[2]交涉先去一个师，现陶很欢迎。进疆部队拟十一月至十二月到达北疆、南疆，否则再迟，一下雪，明年生产就不能布置，军队吃饭就成了很大问题。西南也同样，我们这样大的军队进去，吃饭是很大的问题。因此要看到我们这样大的军队是很大的生产力，明年必须很好地布置生产。

交通情况也决定我们的战略部署。我们拟今年底或明年一月将铁路全部修通。

海军自两只大军舰[3]来后，我们已占优势，现正训练中，他们很积极，他们认清了时局。两只大军舰起义都不是共产党员搞的，这证明中国的人心都已变了。

空军现在力量还很弱，上海、南京受敌人飞机威胁很大。

土匪问题，有个时候闹得很厉害。我军大举向前进军，这些土匪就像头上的小虱子一样，梳子梳过后残留下来了。不肃清这些土匪，谁都不高兴。现在已打得差不多了。

整个作战情况及部署就是这样。至于战后军队组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时候，兵团根本就不要了，甚至军也可考虑不要，因为师减少了。干部到那时就可转出大批人来，现在到处缺人，因此

---

[1]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陶峙岳，原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在新疆率部通电起义。

[3] 指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和“长治”号两艘军舰，两舰先后于1949年2月25日和9月19日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队的这些人，一定要想法很好地转。另外，还有约四十万的旧军官，现在他们在要工作，大约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可做工作。我们原则上对这批人都要有个安置，不安置是不对的。对旧职员也要很好处理，使这些人都能有事做有饭吃。

现在我们有四百多万军队，再过几个月就会有五百多万，加上政府人员就有九百多万人。这样大的数字，非一般国家所能支持，但是我们必须准备支持一个时候才行。

二

关于部队转入生产问题。第七兵团王建安[1]部在浙江曾以一部分转入生产后，得到老百姓很大欢迎。将来部队大批转入生产时，还需要发些生产费，使他们发展生产或者与老百姓合作。这样，部队的生活就改善了，而国家的经费开始还是发给他们，待他们富到一定程度，就可少发或停发。这点各区要开始布置。

三

这次军委会增加了新人员、新的血液，这反映了我们的国防情况。过去我们军委从未开过会，前方忙着打仗，军委就我们几个人来搞。我们主要靠野战军、军区指挥。军队里面主要靠三大民主，

[1]　王建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

并实行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这“三教”使部队很快就能打仗，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政治工作也有一套。现陈粟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其他部队也不少，他们都坚决作战，全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他们互亲互爱。

我们军委会现在增加的几位，我们希望真正团结起来，来研究些问题。今后只要在北京的，我们经常开开会，出点主意。我赞成张文白[1]先生的提议，组织个国防研究小组，开始做些工作，由张先生当组长，刘斐[2]将军当副组长，蔡[3]先生、傅[4]先生当组员，聂荣臻[5]也可当个组员，还有我们的作战部长李涛，罗瑞卿[6]也可参加，以上共七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参加工作，做些事情。需要什么材料，就向聂荣臻要。

现在我们的海岸线要开始建设，这个事情很重要。

---

[1] 张文白，即张治中。1949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2] 刘斐，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8月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知名人士通电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3] 蔡，指蔡廷锴，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军长。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4] 傅，指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5] 聂荣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6]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1949年10月2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图为毛泽东和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

国，不但有利於
貴我兩國之親密合作，抑且有利於世界和
平與安全。為此，本政府特任命王稼祥為駐
貴國特命全權大使，並令其向
貴主席親呈國書，希予延見，藉以信賴。
順頌
貴主席政躬康泰。
貴國國家繁榮，人民興旺。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外交部部長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
北京
國字第壹號

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签名的“国字第壹号”国书。

《毛泽东与新中国军委第一次会议》（油画）

对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1]祝贺新疆和全国解放的复电

（1949年10月21日）

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先生，并转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全体同志们和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全体同胞们：

感谢你的祝贺。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谨祝三区人民和全新疆人民团结一致，协同人民解放军，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1] 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临时代理主席。

关于写解放军进入新疆的短评给胡乔木[1]的信

（1949年10月21日）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2]。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十月廿一日下午三时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

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写的碑文和唁电[1]

（1949年10月、11月）

一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木奴诺夫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二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新疆人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批代表，新疆省副主席阿哈买提江同志，新疆省伊犁、阿山、塔城三区民族军总指挥

[1] 据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唁电的起草时间是1949年10月22日。碑文和唁电中，有2个人的名字，因译音不同写得不完全一致。

伊斯哈克伯克同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同志，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列尔汉同志，和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的罗志同志，不幸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因飞机失事在来北京途中遇难[1]。这是新疆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巨大损失，我对此表示深沉的哀悼。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阿哈买提江同志，伊斯哈克伯克同志，阿不都克里木同志，达列尔汉同志和罗志同志永垂不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 遇难时间应为8月27日。

在赛福鼎[1]入党申请书上的批语

（1949年10月23日）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2]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三日

[1] 赛福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他在1949年10月15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毛泽东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的批语的手稿。

中央关于新疆问题致彭德怀[1]电

（1949年10月23日）

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一）出席人民政协的新疆自治区代表赛福鼎（维族）、阿里木江（乌孜别克族）、涂治（汉人）[2]本日乘机飞酒泉，和你谈话后回新疆。（二）自治区领袖阿哈买提江[3]等五人为出席政协的第一批代表，因飞机在西伯利亚失事不幸牺牲。赛福鼎等三人为第二批代表。赛福鼎为代替阿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关于在新疆各民族中建立共产党及推广外围团体的问题，另电通知。（三）关于民族军（一万四千人）与人民解放军配合工作问题，我们已与赛福鼎谈过。我们认为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赛福鼎，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阿里木江，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涂治，当时任新疆学院副院长。

[3] 阿哈买提江，逝世前是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的领导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此事如何具体进行，请与赛福鼎进行初步商谈。尔后，由分局逐步解决。

中央

十月廿三日

祝贺“海辽”号轮[1]起义致方枕流等电

（1949年10月24日）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1] “海辽”号轮是原国民党政府招商局的运输轮船，1949年9月19日在由香港驶汕头途中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当局。

在一则新闻稿上的批语

（1949年10月24日）

乔木[1]：

此类新闻[2]，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并请拟电告知彭、甘[3]。

毛泽东

十月二十四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指送审的新华社1949年10月24日关于进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逮捕原国民党政府军队中反动分子的新闻稿。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甘，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和绥远[1]负责人的谈话

（1949年10月24日）

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董其武[2]他们九月十九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和朱总司令也发了回电[3]。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个电报，这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不但要求他们执行，共产党更要执行。

绥远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省下面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伊克昭盟，华北局要与西北局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划

---

[1] 绥远，指绥远省，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1954年撤销。

[2] 董其武（1899—1989），山西河津人。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5月28日派代表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签订《绥远和平协议》。9月19日，率军政各界和蒙、汉各族代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通电起义。

[3]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9月20日，毛泽东、朱德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归绥远领导[1]，伊盟政府驻地可在东胜或别处。乌兰察布盟也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伊、乌两盟都设立军分区。两盟的蒙族和汉族都要有人参加政府委员会，这也要同他们商议。

绥远要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省政府、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由傅作义[2]任主任，乌兰夫[3]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绥远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傅作义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管辖的地区人多，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绥东解放区只有八十万人口；军队也是他的多。军区也要统一起来，由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4]任副司令员，薄一波[5]任政治委员。傅先生可再提名别的副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政府由董其武任省主席，奎璧[6]任副主席。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

---

[1] 伊克昭盟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或间接领导。绥远和平解放后，经中共中央华北局与西北局商定，划归华北的绥远省领导。

[2]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3] 乌兰夫（1906—1988），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4] 姚喆（1906—1979），湖南邵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

[5]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6] 奎璧（1903—1986），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后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薄一波去一趟，讲一个来钟头，花几天时间，让同志们把这个问题讨论透。这是统一战线问题，傅先生也要做工作。

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实际工作就按傅先生提出的四个原则三个步骤[1]去进行，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当然，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能办到算好，否则可以用两年。没有战争了，有些事情不能进行得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要先做思想改造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原则问题中央电报上已经讲过：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这个问题在党内要特别讲清楚，争取一年达到目的，但也不能性急。蒋介石统治了二十二年都没有弄好，我们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

---

[1] 傅作义提出的四个原则是：一、坚持团结；二、肃清特务；三、纪律要整顿；四、军队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一、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二、恢复交通；三、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改造。

不行。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这是有条件的。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关于政治工作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对派去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些干部去后不致发生问题。要使他们知道，如果搞不好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即使不被赶出来，你站不住，也是要出来的。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对新部队也一样，你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办法不行。派去的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估计到可能闹别扭。事实上，双方都在观察，看对方对

自己怎么样。那边情况比较复杂，不但人是旧社会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特务隐藏在群众中，北平和平解放时又有一万二千军官回到绥远，他们没有起好的影响，在那里做了“政治工作”。这值得我们检讨，过去没有把这件事办好，是因为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下，没有把他们当同志看。共产党这次派去的同志要表示态度，承认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我也在做工作给同志们看，使我们今后同他们合作得好。最近归绥方面的学习高潮，证明可以用合作的方法改造这些人，团结他们。在这方面，傅先生也要担负责任，采取友好态度。我们的同志去了，一定要采取友好态度，不能排挤他们；你排挤他们，他们不信任你就是有道理的。那一万二千人也要使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新政策好，思想能进步，生活有保证并能改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要使绥远二百万人民，十万军队、干部都感到合作有好结果，会比过去更好，这样他们才相信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就会不满。总之，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们就会欢迎，这一条一天天地得到了证明。双方加重责任，双方做好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傅先生到归绥走一趟起了作用，你可以做给他们看，这样对人民有利，将来可以造就出很多好干部。当然，共产党的责任更大。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比如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讲理，看不看得起人，是不是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你们要做好工作给人家看，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这样才感觉我们好，才能佩服我们。切不能采用国民党特务的那套办法。

和平改造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有这个条件，应当有信心。我们有三百万党员、四百万军队、四亿人民作保证，还怕不成功吗？归

绥方面也要有信心，看到前途。过去我们研究绥远问题，就认为有可能和平解决，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但是用和平方法能不能都顺利解决，还存有疑问。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能行。傅先生去归绥时，也有人怀疑，怕没有前途，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北平和平解决后，我们就手软了，认为对绥远不好再用兵打了，于是出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快解放了，归绥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去了还有一个互相观察的时期，你们说话要兑现，不能骗人。共产党去了，如果做的同说的不一样，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别人会说我们学了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傅先生也会失信于人。所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同人家越搞越好，使他们相信我们。特务也要给饭吃。新政协各方面的人都有，没有人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工作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新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

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1]。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2]。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也会有不愉快的事，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溶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溶越强大，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

---

[1]　叶公好龙，出自汉朝刘向《新序·杂事》。这里是用以比喻口头上拥护统一战线，实际上又害怕搞统一战线。

[2]　大禹、伯鲧，都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部落首领。鲧为禹之父。他们先后奉尧、舜之命治水。鲧采用筑堤堵水的方法未能治平水患，禹改用疏通江河、兴修沟渠的办法治理洪水获得成功。

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绥远组织政府，也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们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办，最容易出乱子。你们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同他们长期合作。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的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我们从未做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要用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工作。

中央关于召开西北局会议的电报

（1949年10月25日）

西北局，并德怀[1]同志：

（一）同意西北局酉迥电，马鸿宾仍任宁夏副主席，邢肇棠改任青海副主席。[2]（二）贺[3]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决定在十一月上旬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名单的最后确定问题等。

中央

酉有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2] 这里所说的关于马鸿宾、邢肇棠的任职意见，后来均有改变。马鸿宾，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9月率部在宁夏起义，1949年12月2日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邢肇棠，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水利委员会主任，1949年12月2日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3]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同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均未到职。

军委关于同意解除十兵团出击潮汕任务的电报[1]

（1949年10月25日）

华东局，并告华南分局：

同意十月廿二日廿三时电所提十兵团解除出击潮汕的任务，以便于攻克金门后迅即部署福建全省的剿匪工作。

军委

十月廿五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中央关于湖南临时省政府改组问题的电报

（1949年10月25日）

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

（一）十月十六日电悉。谭余保[1]在北京时要求到地委去工作，我们已同意，并同克诚[2]谈过。因此，他以不担任省政府副主席为宜。（二）陈明仁挂名为主席的临时湖南省政府，目前一二个月内如尚无必要实行改组，则不必马上改组，仍照现时状态做下去，待一二个月后再行改组为我党占比较多数同时网罗各方民主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省政府，那时可重新审定名单。（三）关于以中原人民政府作基础网罗党内外各方人物建立统辖六省[3]的军政委员会机构问题，将另电通知你们。

中央

十月廿五日

---

[1] 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50年4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3] 指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

转发人民解放军入疆综合报告[1]

（1949年10月25日）

菲利波夫[2]同志：

现将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的先头部队的第一个详报[3]转发给你。这个报告是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在十月十八日由哈密发出的。那时，我军还只到达哈密、吐鲁番、鄯善等

---

[1] 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1949年10月18日20时呈送的《入疆综合报告》。报告说，我军于10月12日从酒泉、玉门、安西之线出动。到10月18日为止，我军第四师第十二团已进至吐鲁番。第十团及师指，现在鄯善。第十一团之一部正向鄯善车运中，一部仍在哈密。军指及第五师师指和第十四团、第十五团仍在哈密。综合报告如下：一、我军入疆得到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二、张治中、陶峙岳的新疆起义部队有三种不同表现：一种是解放军来到前，反动分子组织和煽动国民党军放火，但解放军到后停止了这种现象；一种是解放军到达时，反动分子煽动国民党军队杀人、放火，企图阻止解放军前进；一种是自起义后始终维护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对这三种不同表现的部队采取了不同的方针和态度。三、肃清特务分子、反动分子是保证新疆和平解放胜利的重要条件。四、新疆民族问题仍然复杂，但有党的正确民族政策，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团结新疆各民族，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五、部队纪律在群众中有好的称赞。

地。至十月二十日时，已进到迪化[1]和焉耆。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1] 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

（1949年10月26日）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1]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延安党政军民各界给毛泽东打电报，毛泽东10月26日复电。

毛主席電勉延安邊區黨政軍民

『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

『新華社北京消息』延安黨政軍民各界致毛主席的賀函（見九月廿三日本報）發出後，毛主席特於十月廿六日發電勉勵，電文如下：

延安的同志們和陝甘寧邊區的同志們：

接到你們的賀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謝。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總後方。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人民，對於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我希望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人民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我並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亦應保持過去十餘年間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鬥的作風。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陝北羣衆日報社印發

十一月二日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界的同志们。图为陕北群众日报社印发的号外。

复霍查同志电[1]

（1949年10月26日）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恩维尔·霍查主席：

深深地感谢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祝贺。我在此仅祝中国人民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友谊日臻亲密。我相信，在你领导之下的英勇的遵循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必能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战胜帝国主义和铁托反革命集团的威胁，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霍查同志来电祝贺。这是毛泽东的复电。

复拉比·蒲哈利电[1]

（1949年10月26日）

拉比·蒲哈利同志和阿尔及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同志们：

对于拉比·蒲哈利同志十月九日的贺函，谨表深切的感谢。

中国人民是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压迫下求得解放的。因此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热烈的同情和坚定的信心。我相信，阿尔及尔人民在阿尔及尔共产党领导下和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援助下，终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阿尔及尔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阿尔及尔共产党中央来电祝贺。这是毛泽东的复电。

关于撤销迪化[1]伪监委行署的电报

（1949年10月27日）

迪化临时人民政府鲍[2]主席：

酉马电悉。迪化伪监委行署应予撤销。公物档案希派员接管，造册具报政务院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有人员之生活无着者，酌予维持。

毛泽东

酉感

[1]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

[2] 鲍，指鲍尔汉，当时任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

关于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致斯大林电

（1949年10月28日、30日）

一

菲里波夫[1]同志：

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2](Маїскиї)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

[1]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2] 马意斯基，苏联医学家，当时任中苏医务人员组成的防疫队苏方队长。

二

菲里波夫同志：

十月廿九日来电收到。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卅日

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

（1949年10月29日）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1]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2]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

---

[1]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袁仲贤（1904—1957），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代参谋长。周骏鸣（1902—2003），河南确山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

[2] 叶，指叶飞（1914—1999），福建南安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陈，指陈庆先（1908—1984），湖北黄陂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参谋长。

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

十月二十九日

关于董其武部改编问题给薄一波的信[1]

（1949年10月29日）

一波同志：

十月二十八日信悉。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2]商酌。如果他认为此时发表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有不便处，则军事人员可以事实上先行到职，而正式委任则待政治人员商定后一同行之。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毛泽东

十月二十九日

---

[1] 董其武，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2] 傅宜生，即傅作义，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1月率部在北平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转发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报告的批语

（1949年10月30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们：

现将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同志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给我的一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1]，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因此，请你们认真研究一下，并且印发给全党干部研

[1] 薄一波在这个报告中总结的召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是：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当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议题，如原料如何供给，产品如何推销，劳资关系如何调整，城市粮食如何供应等。二、会前进行充分的筹备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宣传解释各界代表会议的任务和代表的标准、职权等，广泛收集群众意见。代表一般由人民团体推选加政府聘请，推选代表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三、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四、谦虚征询各方面意见，解答问题，使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的关键。认真报告人民政府的工作，尤其把财政公开出来，代表们甚为感动，认为“这才是真民主，是对人民负责”。五、会议后，各个代表向其所代表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和行业，分头报告和解释会议的决议，是很重要的，效果很好。六、各界代表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

究（中央已印二千余份发给中央直属各部委社院校的同志们）；同时请你们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们注意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是为至盼。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

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

（1949年10月31日）

林彪[1]同志，并告子恢，剑英，陈赓[2]及刘、邓[3]：

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一）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4]匪部如被程子华[5]、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6]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7]（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8]（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

---

[1] 林彪，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5] 程子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6] 安南，即越南。

[7] 邓华兵团，指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邓华。

[8] 韶州，即今广东韶关。

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二）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1]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2]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3]（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4]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请你们十分注意粤汉湘桂两路的修复和守备。（三）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5]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四）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

---

[1] 康，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3] 杨得志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4] 粤汉，即粤汉路，指广州至武汉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5] 鲁道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

（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毛泽东

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华中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致林彪[1]等电

（1949年10月31日）

林彪，子恢[2]，湖南省委，并告刘、邓[3]：

（一）程潜程星龄[4]和我们谈得很好。我对程星龄谈的许多话，已托他向你们转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拉好对程潜、程星龄、李明灏、唐星[5]及其他进步分子的关系，争取他们和我党进一步靠拢，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

[3]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4] 程潜，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程星龄，程潜族弟，曾任国民党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在长沙参与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

[5] 李明灏，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参加过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并对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做出贡献；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唐星，原国民党政府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曾对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做出贡献，担任程潜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站在共同纲领基础上，打击反动分子，改造陈明仁[1]部，以利民众运动的发展。（二）陈明仁返湘后表现如何，陈明仁兵团的改造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程潜等一行已到汉口否？（三）请湖南湖北两省委各将统一战线工作及民众运动工作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四）华中须准备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以为管辖六省[2]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拟以林彪为主任，邓子恢程潜为副主任，委员须网罗六省党内党外重要人物。现林彪已去衡阳指挥作战，请子恢考虑是否有必要召集王首道（或金明），陈正人，张玺，李先念[3]四人在一起商量一下，开出一张不包括两广的四十人左右的名单电告中央考虑；或者用电报叫湘赣豫三省委开出三省名单，加上湖北的名单，电告我们（两广名单由中央拟定）。此项名单，希望能于两星期内电告，但不要向外面泄露。（五）关于组织华中军政委员会[4]及请程潜当副主任事，我们已和程潜程星龄谈过。程潜表示愿就副主任，在林彪领导之下从事工作。

毛泽东

十月卅一日

---

[1] 陈明仁，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2] 指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

[3] 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金明，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副书记。陈正人，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张玺，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先念，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4] 1949年12月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时名称为中南军政委员会。

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写的序言

（1949年10月）

捷克共产党的同志们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和我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以捷克文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引以为荣的。中国人民的斗争与欧洲人民的斗争，是一个共同事业的不可分离和互相援助的两个部分，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它们的革命发展阶段也不同。欧洲的关心亚洲命运的一切读者们，由于阅读这些短篇的文件，特别是由于阅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六十条共同纲领，将获得关于新中国的基本常识。我相信，捷克的同志们为帮助欧洲读者认识新中国所作的努力，对于国际革命运动乃是一个可感谢的贡献。

毛泽东

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11月1日）

河南日报

[1]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出席会议，大会期间请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10月下旬，毛泽东题写的《河南日报》报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寄到河南省委。毛泽东共题写了4组“河南日报”字样，经河南日报编委会研究决定并报省委批准，选定了毛泽东圈定的第一组“河南日报”报头，并于1949年11月1日启用。1952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之际，河南日报编委会决定后报请省委批准，改用毛泽东圈定的第四组“河南日报”报头，一直沿用到现在。

毛泽东为《河南日报》题写的报头。

对空军关于航校校址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49年11月1日）

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在北京、济南两处办两个空军学校。[2]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聂荣臻1949年11月1日转呈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转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常乾坤、副政治委员王弼和参谋长王秉璋1949年11月1日的报告说：根据苏联航空专家在国内侦察太原、石家庄、保定、济南等各机场的所获情况及专家的意见，认为太原、石家庄办航空学校不适宜，北京、济南、保定三个地点办航空学校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缺点。济南的缺点是安全性没有十分把握。保定机场条件不错，缺点是房屋条件较差。北京南苑办一个学校目前很好，但在将来军航、民航进一步发展时，也可能感觉有点拥挤。聂荣臻的转呈报告说：航校还有两校地址未确定，现苏联专家意见拟在济南和北京南苑各设一校，请速确定以便筹划一切。

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农村政策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49年11月2日）

一

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德怀同志：

兹将浙江省委十月廿七日关于几个带政策性的问题的意见[1]转发给你们。这些问题各省都有，值得注意，请转发所属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连同自己在反霸减租斗争中所得材料加以研究，以其意见汇报中央为盼。

中央

十一月二日

---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49年10月27日再给华东局并报毛泽东并各地委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反霸减租斗争中8个带政策性问题的意见。这8个问题是：一、减牛租问题；二、雇工增加工资问题；三、大租、小租是否同时减租的问题；四、对恶霸地主的工商业的处理问题；五、在强大农民运动威力下，对有的主要的恶霸地主向政府自首的处理问题；六、积谷、公谷、庙谷、祠堂谷的处理问题；七、反霸中没收的森林及公共森林的管理问题；八、一切公田、公地是否减租的问题。

二

饶漱石[1]同志转浙江省委：

最近关于农村中几个带政策性问题及以前几次报告，均由华东局转来阅悉，并且均已转发各地研究，参酌施行。我认为浙江省委的这些报告都是写得好和很有用的。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
关于长安县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指示[1]

（1949年11月2日）

各中央局分局：

请你们注意长安县的经验。并请你们转发所属注意仿行。

中央

十一月二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的关于长安县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指示。

中央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

（1949年11月2日）

华中局，湖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据新华总社交来天津方面投书一件，内称，“前读《天津日报》刊载贵社本年九月十六日社论《六评白皮书》，内有一段云‘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在当时读悉之后，对于中共中央发布此种适合人情之指示，不胜钦仰。兹于近来先后接读长沙湖南盐务办事处很多同事来信云，他们机关在长沙解放后，延了好久始派人前往接收，并且两个多月未发给丝毫生活费用。直到最近，方将人事处理办法公布。计原有员工三百人，只留了四十多个，其余一律遣散了事，以致大部分人员顿告失业，均以目前谋事远较国民党统治时代困难万倍，无不感到今后生活无着。我常想到，长沙是和平解决的，并且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宣告成立，各级机关增加，该地原来旧有员工，必可全部获得留用机会。纵或机构改组，或原有人数过多，亦可另予安置。但照上述情况，不但我的理想落空，并且湖南此种处理人

事办法，颇与中共中央指示大相违背，难免令人失望。我认为，共产党人说话，向可兑现，遇有言行不符之处，必可纠正。特此函陈贵社，拟请转呈毛主席。如果此事系执行人发生偏差所致，则祈迅电湖南军政委员会及长沙军管会赶快收回成命，将遣散之旧有人员，分别询明各人意志，予以工作机会，发给生活费用，俾维信誉，而定人心。结果如何，盼于报端发表为祷！此上　北京新华总社。我因最近回籍（湖南），故不写通讯地点，亦不署名，请原谅（十月十日于天津）”等语。关于这一问题，应作如下处置：（一）关于投书内所称之湖南盐务办事处遣散多数旧人员一事，请湖南省委派人查明情况并拟具处理意见电告。（二）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最近西北局关于处理旧人员问题有一具体办法[1]，中央业已转发你们参考办理，请加注意，并转告所属注意为要。

中央

十一月二日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9年10月14日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

军委关于同意定海作战方案致粟裕[1]等电

（1949年11月4日）

粟、唐、张、周[2]，并告华东局：

同意你们戌东电所述定海作战方案，我们认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

军委

十一月四日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

[2] 唐，指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指张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周，指周骏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

关于改造和补充陈明仁[1]部致林彪[2]电

（1949年11月4日）

林彪同志，并告子恢[3]：

十一月二日电悉。你对陈明仁部所取方针[4]是正确的。六十二师俘虏兵如尚未分散，可以拨补陈部。

毛泽东

十一月四日

---

[1] 陈明仁，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

[2]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华中军区司令员。

[3]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4] 林彪在1949年11月2日给毛泽东并邓子恢的电报中提出的对陈明仁部的方针是："加紧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改造，学习革命道理，提拔进步分子，改正错误思想，分批集训落后干部，而当前以政治改造为主。"电报中并说准备待广西战役结束后，抽出两三个东北来的独立师或一个完整的军与陈明仁部合编或混编，还说到陈明仁要求将俘虏的国民党政府军六十二师的官兵补充给他的部队。

关于收集和研究上海税收办法的批语

（1949年11月4日）

薄一波[1]同志：

请将此项情报[2]抄送黄敬[3]，并收集上海税收办法，加以研究。

毛泽东

十一月四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上海市委在1949年11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转述的英国侨民致英政府备忘录要点。转述的要点有："英侨情况，现亦略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之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例如，税收方法、税率及制度，全国应一致。在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似非合理，更依照'付税能力'强定工商业税，亦不科学，对工商业均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

[3] 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

为国立戏剧学院题名

（1949年11月4日）

国立戏剧学院

毛泽东为国立戏剧学院题写的校名。

中央关于上报新疆等省政府名单致彭德怀电

（1949年11月6日）

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一）酉陷电悉。新疆情况经你研究后已大体明了，甚慰。（二）同意以曹力如[1]为新疆省政府第一副主席。（三）新疆省政府全部名单，请在此次兰州开会的西北局会议上，连同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省政府名单及西安兰州迪化[2]等市政府名单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作一次通盘考虑，列出一单电告中央最后决定，交中央政府通过以命令发表。（四）新疆省军政委员会问题张治中[3]曾表示不必列名，不要他担任此职不成问题。现应考虑者，新疆既有联合省政府又有联合军区，并以彭为司令员兼政委，似乎不必再设军政委员会了。

中央

十一月六日

---

[1] 曹力如，当时任陕西省陕北行署主任。

[2]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

[3] 张治中，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对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央关于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电报

（1949年11月6日）

华东局：

关于暂时不建立华东人民政府而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以为过渡时期的政权机关及该委员会名单问题，陈刘[1]返沪后谅已转达我们的意见。现请你们迅即加以考虑并将具体名单于本月十五日前电告，以便连同华中及西北两项名单由中央作最后审定提交中央政府通过。我们认为建立此项华东临时政权机关的时机业已成熟了。

中央

十一月六日

[1]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刘，指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

对聂荣臻关于卫生部问题报告的批语

（1949年11月6日）

刘、朱、周、聂、尚昆[1]：

（一）卫生部错误检讨[2]，由尚昆印发中央及军委各部、委、会、社、院、校负责人参考；（二）卫生部所作关于卫生行政会议报告书及所附参考材料，牵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应由尚昆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及薄聂陆乔陈[3]，以待中央讨论，分别采取政府立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此次卫生行政会议上只能当作建议通过，不能作决定。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聂，指聂荣臻。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1949年11月3日对于工作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等错误所作检讨的申明书。

[3] 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聂，指聂荣臻。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乔，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第二点请聂通知贺诚[1]。

[1] 贺诚，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对关于空军司令部名称和关防尺寸刊发问题的批语[1]

（1949年11月6日）

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海军亦照此定名。

暂可如此，将来再改。[2]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李涛1949年11月3日报告的批语。

[2] 李涛的报告说，空军司令部的全名方案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中国人民空军司令部。请主席决定，以便作为关防印文，并拟按兵团一级的关防尺寸刊发。

中央关于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电报

（1949年11月7日）

贺龙[1]同志，并告西北局德怀[2]同志及刘、邓[3]：

（一）同意贺龙同志六日意见。为了统一指挥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部队，为了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此项机关似可称为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何人为副主任及委员名单，请贺提出先在此次兰州西北局会议上斟酌通过，电告中央作决定。此项机关，因无党外人参加，又是临时的，故可将党务工作归其管辖，而不必另外成立党委组织。至于对十八兵团及其他部队指挥作战，如觉用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名义不方

---

[1]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同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均未到职。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便，即可用西南军区司令员名义下命令。你们意见如何，盼告。（二）关于支援十八兵团等部向陕南及川西北进军的许多后勤工作及干部分配等事，应成为此次兰州会议的一项议事日程，决议事项盼电告。

中央

十一月七日

1949年11月7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举行鸡尾酒大会。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举杯庆贺。

邓华兵团可以分出一个师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敌军

（1949年11月9日）

林彪同志，华南分局，并告陈赓[1]：

据广东南路区党委六日电称，湛江只有敌四千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放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2]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3]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已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四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梁广纵队[4]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

毛泽东

十一月九日

---

[1] 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兵团，指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邓华。

[3] 广韶线，指广州至韶关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4] 梁广纵队，指粤桂边纵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广。

中央关于毛泽东去莫斯科时间致王稼祥[1]电

（1949年11月9日）

稼祥同志：

我们已请柯瓦略夫[2]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中央

十一月九日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2] 柯瓦略夫，当时是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负责人。

中央关于征询政协党外代表对华东政权机关意见的电报

（1949年11月10日）

华东局：

九日电悉。你们既已召集三十几个党外政协代表征询对华东政权机关的意见，可以再征询一次，以其意见于十一月廿日以前电告，不得再迟。

中央

十一月十日

向董其武部调派的政工干部必须加以训练[1]

（1949年11月11日）

聂、薄、张、张：

戌江电悉。同意所提调任改编董其武[2]部两个军七个师之师以上政治干部配备全部名单。所有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调集一起有计划地给以去绥远[3]军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并完全研究明白，然后派去，否则不要派去，务望注意为要。

军委总政

戌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和张致祥的电报。

[2] 董其武，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1949年10月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关于安排西蒙诺夫到广西前线参观的电报

（1949年11月11日）

林彪、克诚[1]二同志，并告陈赓，刘、邓[2]：

苏名作家西蒙诺夫同志等一行是否已到衡阳及如何往广西前线参观作战事宜，望电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此事，妥为招待及护送，确保其安全而又能顺利获得参观军队生活，军队作战及地方群众活动等方面的实际材料，以利其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写一部著作，如他们愿意继续随四兵团入滇应表欢迎，并一样妥为保护。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一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司令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政治委员。

[2]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致斯大林电

（1949年11月12日）

菲里波夫[1]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2]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1]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2] 柯瓦略夫，当时是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负责人。

祝贺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1]全体员工起义的电报

（1949年11月12日）

中国航空公司刘敬宜总经理，中央航空公司陈卓林总经理，及两公司全体员工同志们：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

[1]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是原国民党政府的两个民用航空公司。1948年年底，这两个公司将营业机航基地从上海分别迁移到香港和广州。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乘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发布全体员工起义通电，同时飞回大陆的还有11架飞机。

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

（1949年11月14日）

粟裕[1]同志，并告陈、饶[2]：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3]，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如何盼复。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

[1] 粟裕，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1949年10月下旬，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一部在缺乏充分渡海作战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起金门战斗，遭受严重损失。1949年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在攻击定海（即今浙江舟山）登步岛的作战中，对敌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遭到敌守军、援军和海空军的联合反击，被迫撤出战斗。

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1949年11月14日）

德怀[1]同志，西北局：

（一）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2]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3]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二）西北局诸同志是否已到兰州，你们的会议何日开始？此次会议议程甚多，恐须开会一星期左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马，指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青海省政府主席。

[3] 指1949年11月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

右。今后西北政治中心定于何处，西安还是兰州，亦须有所决定。望以主要议程见告。（三）请令王震[1]台和我们通报。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1]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给毛远翔[1]的信

（1949年11月14日）

远翔贤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很高兴。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1] 毛远翔（1924—1996），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房侄。当时在华中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湘潭银田区委书记、湘乡县凤音乡武工队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共长沙市南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等职。

对创办三所军医大学报告的批语[1]

（1949年11月14日）

照办。[2]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第一问题两项似以第二项办法较妥。[3]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副部长傅连暲1949年11月12日报告的批语。

[2] 贺诚和傅连暲的报告提议创办3所军医大学：一、将华北医科大学（又名白求恩医科大学）改为军医大学，主要轮训团级以上干部。二、拟将上海伪国防医学院，改为上海军医大学，轮训团级以下卫生干部及招收新生培训。三、将东北之长春医科大学改为长春军医大学，训练海空军卫生干部与轮训团级以下卫生干部。

[3] 指贺诚报告中所提出的华北医科大学迁址建议。报告认为，该校现在石家庄，占用民房，群众意见甚多，应迁到北京或天津。其中第二项办法为迁至天津，与河北医学院合并，改为军医大学。

给毛煦生[1]的信

（1949年11月15日）

煦生先生：

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先生过去在辎重营担任何职，记不清楚了，便时尚祈见示。毛紫奇[2]尚在人间否？敬颂

健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1] 毛煦生，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那时他在辎重营当文书。

[2] 毛紫奇，即毛子奇，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辎重营任营长。

毛泽东致毛煦生信的手稿。

给毛泽青[1]的信

（1949年11月15日）

运才弟：

来信收到，甚慰。

望努力工作。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1] 毛泽青（1916—1981），号咏才，又称运才，又名万才，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建的胞弟。1937年10月到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习，后在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后勤基层单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辽宁省抚顺市市政工程处预制件厂支部书记、抚顺市政协委员等职。

欢迎仇鳌[1]来京的电报

（1949年11月17日）

一

长沙程颂云[2]先生：

汉口长沙两电敬悉，安抵极慰。仇亦山先生来京赐教，极表欢迎。惟仇先生体弱，冬季北上是否适当。为避寒计似以开春北来为宜，如无此种顾虑则可随时动身。请与仇先生商定见示为盼。

毛泽东

戌篠

二

湖南省政府仇亦山先生：

先后两电均敬诵悉。来京赐教，极表欢迎。何日命驾，尚祈电示。

毛泽东

戌篠

---

[1] 仇鳌，字亦山，湖南知名人士，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2] 程颂云，即程潜，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

给李介侯[1]的信

（1949年11月17日）

介侯先生：

惠书敬悉，深感厚意。

耿侯[2]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

尊翁[3]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率复，顺祝健进！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

[1] 李介侯（1899—1971），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人。早年毕业于湖南机械专门学校。当时在长沙经商。后在北京中国进口公司机械科、外贸部进出口机械总公司工作。

[2] 耿侯，即李耿侯（1889—1928），李介侯的胞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湘潭（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组织委员、韶山农民自卫军负责人。1928年在湘南牺牲。

[3] 指李介侯的父亲李漱清（1874—1957），乡村教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给张四维[1]的信

（1949年11月17日）

长沙福寿桥三号张四维先生：

未阳[2]电悉，甚感好意。湖南需才孔急，似以在当地工作为宜。

毛泽东

戌篠

[1] 张四维（1892—1961），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

[2] 旧时人们在电报中常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方法表示发报时间。未阳，即8月7日。

中央转发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电报[1]的批语

（1949年11月19日）

[1] 指中共二野前委1949年11月12日给杨勇、苏振华、徐运北的电报。电报论述了在贵州新解放区工作的策略问题，主要内容有：一、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是对的，但不可笼统地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现在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以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二、市和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以解决我们进入城市后遇到的货币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和乡村的借粮问题、货币问题、治安问题等。三、在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我们的目的是达到全部改编和掌握，但在执行的步骤和方法上要防止过急的毛病，对少数民族武装尤其要防止这一点。四、中央明确规定，所有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执行这一政策的好处很多。你们对旧员工规定先发短期的维持费是好的，但规定“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是不妥当的。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工资问题极其复杂，务必慎重处理。五、新区问题极其复杂，应从各方面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你们对下级亦应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各负责同志：

兹将西南局十一月十二日致杨苏徐[1]关于论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的电报转发给你们，请转发所属注意。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中央

十一月十九日

[1] 杨，指杨勇，当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司令员。苏，指苏振华，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徐，指徐运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致宣布脱离国民党当局的前资源委员会[1]驻港员工电

（1949年11月19日）

前资源委员会香港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同志们：

十四日电[2]悉，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毛泽东

十一月十九日

---

[1] 资源委员会是原国民党政府垄断工业的主要机构。

[2] 指前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驻香港员工吴志翔等35人1949年11月14日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等的电报。电报中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脱离关系，保护在港资产，听候人民政府接收。

答谢兰那地夫[1]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1949年11月19日）

亲爱的兰那地夫同志：

你在十月十二日的贺电收到了，十分感谢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情的祝贺。全中国人民读到你的电报里所表现的印度革命人民的兄弟友爱，都将感觉欢欣和骄傲。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祝印度爱国人民团结奋斗的胜利！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兄弟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

[1] 兰那地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

复电感谢伊朗共产党

（1949年11月19日）

伊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对于你们的祝贺谨致深切的感谢。

中国人民以敬意注视着伊朗劳动党和伊朗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奋斗，并坚信这一奋斗将获得胜利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关于同意工作方针致彭德怀电

（1949年11月19日）

德怀同志：

同意十一月十五日电所提各项工作方针。

毛泽东

十一月十九日

德怀同志同意十一月十五日电所提各项工作方针。毛泽东十一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手稿。

为《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题词[1]

（1949年11月20日）

为侨民利益服务。

毛泽东

[1] 新加坡的《南侨日报》创刊于1946年，1949年值《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之际，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

毛泽东为《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的题词。

关于任弼时治病问题致斯大林电

（1949年11月21日）

菲里波夫[1]同志：

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同志患病甚重，苏联大夫认为他需要去莫斯科治疗，我们同意这种意见。未知是否可行，请予示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军委关于张治中[1]去兰州致彭德怀[2]电

（1949年11月22日）

德怀同志：

张治中于今（廿二）日上午九时由北京起飞，下午四时左右即可到兰州，请注意迎接。

军委

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六时

[1] 张治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央关于要华中局对处理旧人员提出意见的电报

（1949年11月22日）

华中局：

戌皓电悉。关于处理旧人员问题，请就你们提出的六项问题[1]逐一提出你们的意见。

中央

十一月廿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中局1949年11月19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对9月21日中央关于处理旧人员的各项原则的指示提出的六项问题。这六项问题是：一、中央指示中所谓“接收之国民党旧工作人员”是专指国民党政权人员还是包括经济、文教、交通、银行等方面的人员在内？如是包括国民党所属一切机关，那么对待政权机关与对待企业、文教机关以及这两种机关的旧人员是否还应有所区别？二、“一般均应予以留用”的原则，是说在原机关留用，还是包括调训、下乡工作、退休养老等？凡需政府拿钱养活的人是否都算作留用？三、“但是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可否了解为专指本机关已不需要留用理应精简而额外留用的人员？还是不分留用任职与去职，养活的人员一律都适当地先实行减薪？四、“三个人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

住”的原则，在企业机关是否可以了解为对于企业目前需用的留用职员仍按原职原薪个别调整，仅指对于精简下来的额外留用人员和调训人员才实行匀、挤？还是不分正式和额外的留用人员都一起匀、挤？五、受训人员“在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所谓“减低后的薪资”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累进递减的折合薪资，还是指解放以后我们适当减低的薪资？六、办大的训练班，是分地域或性质集训还是分散在各大小单位原地训练？其经费负担采取统筹统支还是由各地自行解决？11月26日，华中局按中央的要求，对这六项问题提出意见上报中央。

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

（1949年11月23日）

德怀[1]同志，并告贺、习、刘[2]：

（一）复班禅[3]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4]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3]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4] 康，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致班禅额尔德尼[1]电

（1949年11月23日）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接读十月一日来电[2]，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指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10月1日从青海发给毛泽东和朱德的电报。电报中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7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